



# 海外高等教育动态

第3期  
2014年

World Higher Education Trends in World Higher Education  
s in World Higher Education Trends in World Higher Education Trends in World Higher  
**Trends in World Higher Education**  
tion Trends in World Higher Education Trends in World Higher E  
rd Higher Education Trends in World Higher Education  
d Higher Education Trends in World Higher Education  
rends in World Higher Education Trends in World Higher Educat  
gher Education Trends in World Higher Edu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培育基地  
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 编委会

主任：李岩松 马万华

委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白燕 陈洪捷 韩笑 蒋凯 李岩松 陆骄  
马万华 施晓光 文东茅 王晓安 王勇 夏红卫  
须珺 阎凤桥 严军 郑如青

主编：韩笑

副主编：陆骄 须珺

编辑：王康威 顾嘉杨 刘素素 孙齐圣 张可欣 张勿扬  
张伊妍

设计：何酉

联系电话：(010)62769305

网址：[www.oir.pku.edu.cn](http://www.oir.pku.edu.cn)

《海外高等教育动态》致力于编译世界高等教育的最新信息，同时刊发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努力为高教同仁提供了解世界高等教育新趋势的窗口。本刊所刊发的专题文章，版权均属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所有，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方式复制、改编、摘编、转载和传播。本刊所登载的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不代表刊物主办者的立场和观点。

## 目 录

### [ 专题研究 ]

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政策走向..... 02

### [ 国际教育热点 ]

开展研究生教育是为满足公共利益还是个人求职需要? ..... 07

欧洲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国际学生流动..... 09

伊拉斯谟项目的合作是否应该收费? ..... 13

### [ 世界大学动态 ]

欧洲学者流动性发展的进程与问题..... 15

美国: 11 所研究型大学组建大学创新联盟..... 17

高校推动对学术工作者参与社区活动的奖励政策..... 19

芝加哥大学形成新合作伙伴关系以帮助当地居民就业..... 23

斯坦福大学设立健康网站, 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健康资源及社区帮助..... 25

亚洲网络学习市场规模大幅增长..... 26

卢旺达卡耐基梅隆大学 IT 专业首批学生毕业..... 29

印度大学排名将包含社会贡献指标..... 30

2015 年后欧洲对非洲高等教育援助初具雏形..... 33

### [ 港澳台教育 ]

台湾大学与日本京都大学、筑波大学开展校际合作..... 35

### [ 媒体声音 ]

全球大学毕业生力不胜任工作要求的现象不断增加..... 37

私立高等教育市场新发展..... 40

大学的未来 —— 网络学位..... 43

### [ 学术前沿 ]

澳大利亚教育部长访问北京大学..... 51

### [ 聚焦世界一流大学 ]

柏林自由大学的国际化..... 52

## 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政策走向

蒋凯<sup>①</sup>

在全球化浪潮下,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调整,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市场化、民营化、分权化和问责制走向。这些政策的实践动力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和财政紧缩,理论依据是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对这些政策的批判性分析表明,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观不能妥协,政府不能放弃对公共高等教育的责任,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应当得到保障。

### 一、高等教育市场的形成

市场化(marketization)是全球化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越来越体现出市场的特征。高等教育市场指高等教育中的选择和竞争机制,其基本特点是注重选择和竞争,以市场的方式配置高等教育资源。

过去二三十年间,许多国家逐步形成了高等教育市场或加强了高等教育的市场趋势,主要表现为:政府减少公共拨款(降低高等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降低公共高等教

育经费在高等教育经费中的比例等),高校拓宽经费渠道;实行学费政策,提高学费水平,增加学费在高校收入中的比例;举办私立高校,扩大私立高等教育规模;改变对高校的经费拨款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激励高校进行技术转让,推动知识商品化;高校开展培训、网络教育和其他有偿服务;招收自费留学生,甚至将留学教育产业化;等等。

在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市场的主要内容和形成方式并不一样。市场机制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调节机制。近年美国高等教育市场趋势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为各类高校提高学费水平、一些州引入“高等教育券计划”、营利性高等教育崛起、高校加大技术转让力度。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公立部门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两国高等教育市场的形成,主要表现为提高国内学生的学费水平,对国际学生实行“全成本付费”政策,将留学教育产业化,公立高校为学生和各类公共经费开展竞争。20世纪90年代以前,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普遍实行免费的公立高等

<sup>①</sup>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秘书长。

教育制度，高等教育基本是非市场的政府服务，这两个地区的转型国家高等教育市场的形成主要表现为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和实行学费政策。

高等教育市场形成的理论来源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主张竞争，以市场机制作为经济生活的根本机制。许多国家还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全成本学费”理论的影响，逐步降低公共经费在高等教育经费中的比例，要求学生为其接受高等教育承担更多的成本。

高等教育市场趋势的加强，有两大背景，一是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不断增加，二是出现世界性的高等教育财政紧张。

市场的形成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高等教育市场的形成，缓解了政府的经费压力，拓宽了高校的收入来源，促使高校节约成本和提高办学效率。但是，高等教育市场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市场的形成或市场趋势的增强，使高等教育的传统价值观特别是知识的公共性和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受到挑战，弱势群体的机会受到威胁，并且加剧了优势院校与弱势院校之间的不平衡。

## 二、高等教育民营化的兴起

民营化（privatization）是一股方兴未艾

的世界潮流，民营化与市场化密切相关，实际上许多国家市场化的主要途径就是民营化。

高等教育民营化是民营化大潮的组成部分之一，被普遍地推崇为一种提高效率、适应多样化要求，以及促进各类院校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并减少政府经费的机制。高等教育民营化是高等教育活动、资产和责任从政府或公共机构转向个人和民间组织的过程，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多指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目前，在全球高等教育学生中，就读于私立高校的学生约占 31.3%。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需求日益增长和经费不断紧缩的双重推动下，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私立高等教育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传统上公立高等教育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欧洲，私立高等教育缓慢发展。在前苏联和东欧的转型国家，私立高等教育获得了较迅速的发展。在私立高等教育占有一定规模、精英大学主要为私立高校的美国，近年来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部门规模增长不大，但私立营利性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在一些拉美国家，私立高等教育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私立高校及其学生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私立高等教育有所发展。私立部门在世界一些主要区域和国家的

高等教育系统中所占的比例为：欧洲，16%（其中中欧和东欧高于西欧）；美国，26.2%；拉丁美洲，48.6%；亚洲，36.4%；大洋洲，约3%—9%不等（其中澳大利亚为3%，新西兰为9%）；非洲，14.6%。

高等教育民营化兴起主要有三点原因：

（1）高等教育需求不断增长；（2）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财政紧张；（3）高等教育作为“私人产品”的观念不断发展。支持者认为，民营化扩大了受高等教育机会，使得更多的求学者在传统公立高校之外的机构找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且还促使高等教育效率得到提高。

但是，高等教育民营化不是“万灵药”，它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私立高校由于收费较高，较少惠及社会弱势群体；许多办学者以营利为目的，忽视教育质量；除了办学历史悠久的精英私立高校，各国新设立或办学时间不长的私立高校的教育质量普遍较低。

在高等教育民营化大潮中，政府需要认真考虑自己的角色。一方面，在提供充分的公共教育机会的同时要鼓励合理的举办私立高校的意愿，在公立私立高等教育之间形成适当的平衡；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私立高校的监管，保障私立高等教育的质量，维护受教

育者的权益。

### 三、高等教育分权的推进

分权（decentralization）又称分权化，与集权相对应，指在平行运行当局之间的权力分散以及权力从高到低的转移。高等教育权力大致包括六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系或讲座、研究所；第二层次为学院或学部；第三层次为大学或学院；第四层次为多校区的学术管理组织；第五层次为州、省级政府；第六层次为中央政府。高等教育分权主要指中央向地方分权、政府向高校分权，也就是第六层次向第五层次分权，第五和第六层次向第三和第四层次分权。

分权是一种流行的政府改革形式，许多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推进分权。过去二三十年间，在高等教育管理中有的国家加强了集权，但更多的国家在推进分权，至少在政策话语上强调分权。

高等教育分权的理论基础与其他形式的分权基本一致。在弗里德曼看来，分权是保护自由的重要途径，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同时权力必须分散。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分权和主动参与式管理，主张政府管理应采取分权和评估模式，将更多的权力分配给公共机构如中介组织、评估机构等，减

少直接的干预和控制。

在近年来，国外推进高等教育分权两个最突出的两个例子是日本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和西欧大陆国家的扩大高校自主权。

过去，日本国立大学不具有法人资格和财政自主权，其教职员工享有公务员身份。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逐步将国立大学纳入以市场与竞争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之中，以提高国立大学办学效率、减轻政府财政负担。2004 年实施的法人化改革改变了国立大学的政府行政机构身份，在赋予其管理自主权的同时，推动了大学财政自主。在改革过程中，日本政府并没有放松对国立大学的管理，而是通过“外部评估”的方式间接管理国立大学。

传统上，西欧大陆国家的高校享有较充分的学术自由，但它们并不是自治机构，而是长期作为政府部门的一部分，办学自主权比较有限。80 年代中期，许多西欧大陆国家推动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改革，同时引进了评估和问责机制。在给予高校更多办学自主权的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撤退，只是改变了工作方式。

在高等教育权力配置失衡、中央政府权力过大、地方政府权力过小、高校自主权不足的国家，高等教育分权十分必要。但是，高

等教育分权的过程充满了吊诡，需要警惕形式化的分权。尤其重要的是，高校应当获得充分的、切实的自主权，并且在获得一部分自主权（如财政自主权）的同时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自主权（如学术自主权）为代价。

#### 四、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实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问责制（accountability）在教育行政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问责制意味着某种活动的正当化，要求通过最有效的方式证明某种活动取得了预定的结果和绩效。高等教育问责制包括合理使用资源、提供证据、评价证据、注重成本及效果、改进教育过程等要素，从类型上说包括外部问责（如政府对高校的问责）和内部问责（如高校对教师的问责），以及教学问责、科研问责、财政问责等等。与行政问责制、企业问责制相类似，高等教育问责制关注效率、效益，注重效益、产出。

在高等教育领域，问责制、质量保障、评估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高等教育评估是问责制的实施形式，也是质量保障的一个基本途径。奥斯本和盖布勒（David Osborn & Ted Gaebler）宣称，测量能推动工作，如果不能测定效果，就不能辨别是成功还是失败。高等教育问责制以评估作为基本的实施形式，

目的在于保障和提高教育质量，当然还包括合理使用教育资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旨在节约公共高等教育资源而推行的问责制与为保障高等教育质量而推行的评估逐渐得到了发展。1997年，英国正式设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建立该署的目的在于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其主要职责是制定评估标准、组织评估等。法国国家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基于院校现场访问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报告而组织外部评议，评估较为宽松。在美国，绝大多数高校经由非政府的区域教育认证机构认证，但认证机构并不提供质量评估，评估主要由各院校自行组织。美国各类高校目前普遍对教学科研人员进行教学评估或教学、科研双重评估。近年，美国联邦政府计划介入对获得联邦学生贷款和科研资助的高校的问责。

从实践看，高等教育问责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促使高等学校树立和加强责任意识，关注资源使用的效率，并采取措施提高效率。高等教育问责制既有积极作用也有一定的限度。高校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多个目标，这些目标相互关联，使得绩效责任非常难以度量。最关键的是，高等教育的运行以高深知识为基础，与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生产、政府的科层管理相比，高校的知识操作过程更为复杂，知识操作需要较高度度的自主和自由，过于严格细致的问责要求则不利于基于高深知识的高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对高等教育问责制应当有客观、全面、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是否强化问责制要保持警惕，以防止过度问责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侵蚀和对教学科研秩序的干扰。



## 开展研究生教育是为满足公共利益还是个人求职需要？

近日，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委托牛津大学的学者们，在新兴市场国家、北美和欧洲等在内的一些国家，展开了一项关于研究生教育的国际研究。这项研究主要关注澳大利亚、英格兰、德国、印度、挪威、苏格兰、西班牙和美国等国的研究生教育，分析这些国家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准入门槛和学生就业等内容。

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大体相似，但由于国家间个人受教育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也表现出了一些差异。在《研究生教育的国际比较：质量、准入门槛和学生就业》这个报告中，Gillian Clarke 和 Ingrid Lunt 提出“多少博士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可以满足国家的需要？”和“谁应该为研究生教育付费？”等问题。他们还指出：在绝大多数国家展开的一场关于研究生教育收益的讨论，导致了研究生教育资助方由政府向个体的转变。最近比较流行对于就业能力的关注，就业能力也是研究生教育各种收益中的一种。

伴随着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教育质量保持与扩招的压力，高等院校在全球范围内对研究生生源展开了竞争。

### 需求问题

Clarke 和 Lunt 指出，“需要多少博士毕业生”、“如何资助博士生项目”以及“博士生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等这些问题对所有国家都具有挑战性。在一些国家，博士毕业生已经供过于求，为获取博士学位而投入时间和精力是不值得的。

博士生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后继的学术力量，高学位仅仅是部分职业的必备条件。政府和雇主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质量的工人数量越多越好。

为了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如何培养适量的博士毕业生，一方面保持对学术研究、行业性研究的稳定供给，另一方面满足其他职业的需求。

在西班牙、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一些领域，研究生教育的收益变小了。在英格兰和欧洲，有人担忧博士生教育供过于求，尽管大部分博士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技能。除了印度之外，本研究中的其他七个国家都计划保持或者减少博士毕业生的数量。

### 技术偏爱

在英国，博士毕业生可能雇佣到需要较低

资质的岗位。研究人员指出博士毕业生等拥有较高技能的人员改变了工作市场环境，博士毕业生的工作角色处于较低水平，这些工作岗位本来只需要与其相当资质的人员。

大型企业招聘博士毕业生，其意义不仅局限在技能层面，还有个人素质方面的考虑。如果其招聘的博士毕业生在企业中获得了很大成功，企业还会继续到他们的母校继续招聘。

在英国，越来越多的博士研究生为了获得在就业市场的优势攻读博士学位，他们并不准备从事学术事业，但是这并没有降低他们对于科研的热情。

### 国际比较

澳大利亚实行按收入比例还款体系，而英格兰实行的是不确定性研究生资助体系。研究者担忧债务负担可能妨碍大学毕业生继续研究生阶段的深造。家庭富裕的学生可能因此获得优势，另外大学必须将本科生的学费收入用于资助研究生项目。Clarke 和 Lunt 认为英格兰的高校学费相对较高，这会降低研究生教育的全球竞争力。

在德国，研究生资助的不确定性、开始收取学费、精英院校与其他院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些因素导致教育质量参差不齐。

印度的优势包括：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提

高研究生教育参与率的潜力、为扩大弱势群体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中的受教育机会所做的持续努力。挑战包括：一些机构教育质量相对较低、精英院校与其他院校的划分、贫富差距、城市和农村社区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限制。

挪威的优势包括：免交学费、博士研究生可以享受与职员相同的待遇，比如签订雇佣合同以及权利等。但是，研究生学位中新的评分体系的引进，可能造成分数膨胀，前后缺乏一致性。

苏格兰与英格兰不同，苏格兰的优势在于利用特殊的方式开展合作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但是同时增加了博士生培养结构的复杂性。

西班牙的挑战来自经济领域和高等教育领域的资助问题，还有守旧、保守但发展中的学位体系。

美国研究生教育在全球的主导地位面临的挑战包括：较高的学费、国家质量保障机构的缺失。另外，质量保证责任转移到各个州，将会导致教育质量的不一致，研究生教育学术标准参差不齐。

该报告认为，对所有国家来说，需要确认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研究生教育的扩张是可持续的，并且声明具有研究生资质在何种情况下对满足公共利益和个人求职需求均具有益处。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张优良编译)

## 欧洲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国际学生流动

[德] 乌尔里希·泰希勒

### 一、《博洛尼亚宣言》的签署

高等教育的精髓是不受地域之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各国不断采取措施削弱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差异和不同国家间高等教育体系相对隔绝的状态。1998年巴黎索邦大学校庆之际，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教育部长宣布他们将建立一个“统一”的课程和学位结构。这一寻求广泛支持的理念被视为一个巨大的进步，为进一步的行动奠定了更为广泛的基础。1999年6月，29个欧洲国家的部长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根据这一宣言，将建立一套课程和学位结构方案，并于2010年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此后分别于2001年在捷克的布拉格、2003年在德国的柏林、2005年在挪威的卑尔根、2007年在英国的伦敦、2009年在比利时的勒芬以及2010年由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联合共同筹备，在奥地利维也纳和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部长级会议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监督、指导和激励。在此期间，共有47个国家加入了这个合作组织。

### 二、博洛尼亚进程的改革

这个由国家级倡导者促成的《博洛尼亚宣

言》开启了欧陆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这一改革过程称为博洛尼亚进程。

《博洛尼亚宣言》的核心是要在欧洲建立起一个课程和学位的整套体系。此外，《博洛尼亚宣言》还提出一些相关措施以加强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整合。首先，应当引入学分制以衡量学习成果，并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衡量学生留学的研究成果；其次，所有学生毕业后应颁发包含学习课程和学习成绩信息的“文凭说明书”，以便得到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认可；再次，为增强“品质保证”，欧洲各国应加强建立评估体系的合作。

这种结构改革和相关措施从两方面促进了学生的流动：一方面，增强了欧洲高等教育对世界各地学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内部的学生流动。

2010年，许多关于博洛尼亚进程的研究公布了，据此对博洛尼亚进程及其进程中的变化进行阶段性总结。

实施的速度：博洛尼亚进程在欧洲各国的实施速度差异显著。一些国家在2002年就已推出新的学位结构和相关规定；一些国家很早开始实施，但很多年后才得以推广；一些国家

就如何改革进行长久的讨论；还有一些国家并未实施。

学士—硕士学位结构的引入：据欧洲大学协会的调查显示，到 2010 年 95% 的成员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实施了学士—硕士学位结构。

研究领域的变化：欧洲大学协会 2010 年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医疗领域引入学士—硕士学位结构的比例较低，其他领域引入该结构的比例略高。

学士学位作为最终的或过渡性学位：大学的学士课程主要作为向硕士学位过渡的课程。

课程学习年限：虽然强调建立共同的目标，但个别国家对目标的释义不同使其课程学习年限相异。

相关的课程改革：在引入学士—硕士学位结构的大学中，77% 的大学已将课程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博洛尼亚进程的专题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博洛尼亚进程的专题范围已扩大。

行动者的参与：博洛尼亚进程的许多评估者指出，从一开始政府就是关键变革最强有力的支持者，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者随后也很快参与进来。

普遍接受程度：由于有关博洛尼亚进程优劣的辩论非常激烈，所以其普遍接受程度不是很高。

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的拖沓过程：参与博洛尼亚进程的欧洲国家部长们在 2009 和 2010 年的公报中表示，后十年要进一步落实、修订目的，以实现更远大的目标。

博洛尼亚进程在欧洲各国的多样性：欧洲各国虽然加强了高等教育的统一合作，但各国间仍保有较强的多样性。

### 三、博洛尼亚进程和学生流动

由于《博洛尼亚宣言》将增强学生流动作为战略性目标，它必然会设定一套适于检视学生流动量化发展的统计调查体系。但在实践中，这些关于学生流动趋势的统计数据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按照传统，国际统计数据提供的信息是关于外国学生和境外留学生的数据，这些数据并不能准确表明学生流动；第二，许多国家对临时流动学生的统计是不全面的；第三，已有的国际统计数据并未对“学位流动”、“文凭流动”、“临时流动”和“短期流动”学生做出区分；第四，国际统计数据并未按学生的国籍或修习学士或硕士课程做出区分；第五，目前没有适用于统计和调查欧洲全境学生流动的方法。由于已有统计数据的种种不足，我们只能在外国学生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一个大致在学生流动数据。

不过，已有数据表明在 1999 — 2007 这

八年间，欧洲大陆外国学生的绝对数量增长是显著的。这一时期，来欧洲的外国留学生增长率明显高于全世界外国留学生增长率。这些数据进一步证实欧洲高等教育对世界其他地区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更具吸引力。所以尽管可获取的数据存在不足，但《博洛尼亚宣言》中关于学生流动的两大战略目标之一还是实现了，即欧洲高等教育对世界各地学生的吸引力大大增强；而另外一个战略目标并未达成，在 21 世纪的前十年欧洲内部的学生流动较缓。

#### 四、学生流动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国际学生流动数据表现出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不能将流动学生视为单一群体。对欧洲来说，国际学生可以划分为三类不同群体：第一类流动学生来自中低收入的国家，他们大部分到经济发达、高等教育体系成熟的国家修读学位；第二类流动学生从经济发达的国家到另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修读学位；第三类流动学生是在经济发达国家的临时流动学生。

第一类流动学生可称为纵向流动学生，他们大部分来自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具有学术抱负，希望通过修读更高的学位获得成功。但这部分学生也将面临一些问题：第一，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外国留学生的辍学率比当地学生高；第二，一些来自学术

水平较低国家的留学生获得学位比较困难；第三，一些学生成功的获得学位，并受雇于该留学国家或其他发达国家，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输出国的人才流失。

第二类流动学生根据已有数据来看其异质性较强，攻读博士和硕士学位的留学生中，这类流动学生所占比例较高。大部分此类学生留学是受接收国大学的学术声望所吸引，不过相邻国家间的此类流动学生不多。

第三类流动学生是临时流动学生，关于这类学生的研究较多。据统计，资助临时流动学生的“伊拉斯莫计划”近年来每年资助近 200,000 名欧洲学生到另一个欧洲国家接受一到两个学期的高等教育，学生所获的学术成就在毕业归国后也能得到本国认可。此外，对欧洲的临时流动学生而言，欧洲国家高等教育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国际化程度更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临时流动的必要性。

#### 五、学生流动和博洛尼亚进程的阶段性成果

国际学生流动的增长已成为一大趋势，特别是第一类纵向流动学生人数增长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中低收入国家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大幅扩张，一方面是由于出国留学学生总数也有小幅度增长。在欧洲，博洛尼亚进程使欧洲对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更具吸引力。许多欧洲国

家通过改善服务、增加英语学习项目并大力重视国际学生的学习项目来促进学生流动。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举措能发展到何种程度，而且大部分专家认为为了帮助欧洲以外的外国流动学生更好的适应欧洲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这些举措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高等教育政策鼓励增强向内的学生流动和向外的学生流动，而向外的学生流动在博洛尼亚进程中更多的表现为向欧洲其他经济发达的国家流动。20世纪90年代，在“伊拉斯莫计划”的支持下，欧洲境内临时学生流动大幅增长，许多学生由此认为在欧洲内部的“相异而学”具有很高的价值。至于21世纪前十年欧洲内部临时流动学生的增长情况，已有数据较为匮乏，很难评定较之20世纪90年代欧洲境内临时流动学生的增幅而言，博洛尼亚进程是否促进了欧洲境内临时流动学生的增长。

对中西欧和东南欧的学生来说，这种短期的出国留学是一种特殊的丰富经历，也对提升他们的职业能力有帮助。欧陆国家间的这些差异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逐渐弱化，在此期间这

些流动学生仍需帮助才能适应国外不同的学习环境。

对西欧国家的学生来说，欧洲境内的短期留学是一种容易实现的常规性选择。受“伊拉斯莫计划”所倡导的“相异而学”观念的影响，西欧国家临时学生流动人数在未来还将呈增长态势，但这一态势还能持续多久则未可知。如果欧洲各国的课程改革逐渐趋同，那么这种逐渐增强的相似度也许会削弱“相异而学”的价值。如此，临时流动学习则变得不那么必要了。

博洛尼亚进程近期制定了这样一个目标，即20%的欧洲学生要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修读学位或进行短期学习。西欧的一些国家已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目标在欧洲其他国家也会实现。不过，除了依靠政策驱动，如何通过新的方式使欧洲境内的跨国学习变得更有价值也是值得考虑的。所以，旨在使欧洲境内的跨国学习变得更有价值的课程改革新观念的萌发更为值得期待。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崔景颐编译)

## 伊拉斯谟项目的合作是否应该收费？ To fee or not to fee in Erasmus Mundus collaborations?

瑞典学生参加由不同国家多所学校组成的国际课程时是否应该被收取学费？这已经成为瑞典高等教育收费的关键问题。政府已经起草一项法律来说明在何种情况下学费不应被看作为学生的费用。

今年六月，瑞典教育和研究部门向多家高等教育机构和工会发布了一份长达九页的瑞典语备忘清单，并向这些机构征求关于在瑞典国际合作的大框架下引入收费课程的意见。

该项提议最初来源于瑞典学生对乌普萨拉大学的质疑。他们认为乌普萨拉大学决定向参加欧盟伊拉斯谟计划的硕士生收费是不合理的，这些学生的课程由欧洲七所不同的大学提供。

两名学生将这样的情况报告给了大学校长，而校长认为这种做法是与瑞典的免费教育立法相冲突的。

### 问题需要澄清

在这份备忘清单中，教育部讨论了学费问题是否需要澄清，尤其是在瑞典参加学生联合培养项目并且对方学校要求收取学费的时候。同时欧盟法律规定其成员国的公民必须受到同等对待。

教育部写道，当瑞典的公立大学和学院参加欧洲财团联合计划时，“学生可能给一个或多个国外大学支付费用，或者也可以直接通过财团支付学费，甚至是他们在瑞典大学学习期间的费用。”

“这种情况也可能在已经与国外高校达成一致一致的瑞典大学和学院出现。当学生在瑞典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时，他们如果同样处于交换生的框架之内，那么他们就可能需要向自己所学习的海外院校交纳学费。”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建立在确保瑞典法律具有更大灵活性的基础上的。在高等教育项目中，为了在多个成员国之间达到平等，教育部提议对两项法律条文进行更改。

其中一条法律条文的制定非常不同寻常，该条文明确规定了当学生参与到国外高等教育框架下时，所交的费用就并不属于教育费用。

这条法律写明了学习的花费不被视为学费的情况。备忘清单中指出这条费率应该在 2015 年 2 月 1 日开始强制执行。

### 争论焦点

今年夏天，很多机构和组织将其意见反馈给教育部，其中积极与消极的声音各执一词。

曾有学生报纸针对此事展开过激烈的辩论。隆德大学副校长埃里克森将教育部的解决方案



描述为“并非完全的完美无瑕。我们有责任不去选择退出的任何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有一个事实指出了这项决定的漏洞，即学生现在需要每年支付大约 8000 到 9000 欧元的金额。”他更倾向于由学校来负担这项开支。

可以代表 10 万名学生的瑞典职业联盟组织的学生分支 SACO 则将这项提案总结为“有利于学生”。

但是瑞典全国学生会的主席丽贝卡却这样告诉《大学世界新闻报》：“学生会对政府的提议持批判性意见，因为这意味着收费是指谁收到这笔钱，而不是谁是被迫支付——也就是说，学生必须要支付。”

“学生会的立场认为，兴趣和资格应该在教育方面的选择上起决定作用，而非经济条件。”

瑞典大学教师联合会 SULF 则表示，学术界也不同意教育部备忘清单的提议，他们认为“这个问题进一步解决了学费模型的建设，即教育的花费应该有教育预算承担。”

他们说：“高等教育免除学费的原则需要被确立成为一项民主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再讨论学生的花费究竟算不算学费就没有什么意义

了。”

然而，瑞典高等教育理事会 UHR 则是“非常积极地认为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解决方案，它使瑞典的机构向其他国家的机构一样，甚至是在未来也有机会在相同的条件下参与财团”。UHR 建议，法律文本应该进行修改，以使其更加透明。

斯德哥尔摩大学在至教育部的信中提到，在没有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学校会支持他们对于瑞典机构参与财团并收取学费的提议。但是学校要求其修订备忘清单以使条款更加明确。

拥有 50 万学生的瑞典职业联盟认为该提议的后果将会“难以预料”。

联盟采取了消极的看法，并建议对“深层次的文档进行进一步检查核对，确保其中的出发点必须是要维护学费免费教育的原则，而非损害该原则的执行。”

专家联盟的发言人厄休拉·贝格代表 6 万 3 千名学生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该建议是不能被接受的。“对于瑞典的学生，这将是一笔自中学毕业后开始无论在哪里学习都需要支付的费用。”

“SSR 此前警告称，开征学费将导致国际学生数量的减少，从而削弱瑞典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与质量。之前的这个担忧现在已经发生了。”



贝格说，这项新的提议继续着此前瑞典高等教育的私有化的趋势。

大学世界新闻对位于斯德哥尔摩的教育和研究部门进行采访时提问，此提议何时会被提交给议会。高等教育司的伊丽莎白表示，政府仍然在做准备，因此具体的时间表目前还不能给出。

翻译：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2 级张可欣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40925164328434>

~~~~~

### 欧洲学者流动性发展的进程与问题 Progress, problems with researcher mobility in Europe

德勤咨询公司正在开展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以检测欧盟的整体研究和创新情况。目前，公司将研究人员 2014 年的报告提交给欧洲联合会，该报告结论指出：欧洲学者的流动性进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同地区的进程不同步，并且在某些国家的学者招募、学者技能、工作环境以及职场机会等方面依然存在挑战。

这项报告表明：“在对研究人员的吸引力

方面，欧盟目前显著落后于美国，但按照顺序排列，欧盟则远高于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和巴西。”“从 2007 年到 2012 年，欧盟研究的卓越程度增加了 6 个百分点，达到目前的 47.8%，而这个数字在除希腊以外的每个欧盟国家都在持续增加。表现最佳的欧盟国家是北欧成员国荷兰、英国和比利时等，这些国家的评估得分都超过了 60 分。”

一套现代化的方式已经被用于 38 个国家的研究进程。研究人员将其定义为“新知识的构思或创造、产品、流程、方法、系统以及相关项目管理中的专业化人员参与”。

报告中提到，“一个开放和有吸引力的研究人员劳动力市场是欧洲研究领域的关键。在市场中研究人员与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一个国家”。

目前在欧洲各个国家内部消除或缓解流动性障碍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同样还有推进博士生培养以及使研究领域的事业更具新引力。然而不同国家的进程不同步，并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在某些地区目前存在着“缺乏公开、透明、择优的招聘制度，一些早期的研究人员没有足够的适合劳动力市场的资质，还有一部分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比较差，或者工作机会相当有限”。

该报告对于不同类别的关键调查结果均进行了概述。

### 研究人员的市场份额

2011年，欧盟约有163万名全日制的研究人员，而同期美国有149万、日本有66万，中国有132万名研究人员。

从2000年到2011年，研究人员在欧盟的人数增长平均每年超过4%。报告提出：“这样的增长速度快于美国和日本，但慢于中国。”

然而，研究人员占据的劳动力市场份额则显著低于美国和日本，“即使有迹象表明，这个差距正在缩小”。此外，欧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直到欧洲企业中公共部门的研究人员的占比可以与美国、日本和中国相匹配。”

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研究人员的培养方法，旨在培训足够多的研究人员以满足国家的研究和发展目标，包括研究的活动计划、全新的立法或更新法律条文，研究事业宣传计划，以及博士生培训或激励环节的改善提升。

### 与工业合作

虽然与私营部门的互动对于开发研究结果而言是一种鼓励机制，但调查显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移动到私营部门进行短期工作“依

然是非常例外的特殊情况，即使它被认为是潜在的有利于研究人员的职业生涯，抑或是有利于研究人员获得资金并取得研究成果。”

报告中提出，“研究人员似乎在某些领域由于准备不足而受到了束缚，例如知识产权以及知识转移的领域。最后会使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进行合作，导致联合出版水平比美国或日本低得多。”

许多国家正在不停地推动并提升大学、研究机构、科研公司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提出了一些措施以提高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技能。有一些公司拥有合作类项目、开发方案、研究机会以及实习项目的流动性计划，专业博士可以参加到这些公司并且结合教学和私营部门的研究。

报告中说：“比利时、克罗地亚、丹麦、法国、希腊和挪威都采取了措施，在过去的几年中打造产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双向流动，目标是连接起科研与市场应用之间的桥梁。”

### 流动性和国际吸引力

报告认为，“流动性”是一个时代核心理念，并经常与“卓越”、“动态网络”，“提高科学的绩效”，“提升知识和技术转移”，“提高生产力，并最终增强经济和社会福利”相关。

“有证据表明，研究人员在国际上属于具

有高度流动性的人群。在过去 10 年中，31% 左右欧盟的研究人员在博士的后期阶段都在国外（欧盟或全球）工作至少超过三个月。”

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流动性的体验是积极的：80% 的国际流动研究人员认为移动性对他们的研究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超过 60% 的人认为流动性有在很大的程度上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起到了推动作用；55% 的人认为其职业发展的改善和进步是流动性的结果之一。

但依然有 40% 的人认为流动性在两个方面会产生负面影响——职业选择以及报酬的增加。报告中指出：“这背后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可能确实存在问题，如许多流动性问题是缺乏认证的，以及存在着‘被迫’流动的情况。”

非欧盟博士生在博士学位学生中的比例份额彰显了研究系统的开放性和吸引力。“欧盟的平均比例为 24.2%。”

为了克服剩余的其他有关流动性的障碍，欧盟委员会建议修改科学签证指令，并承诺支持建立一个泛欧洲的为研究人员补充养老的基金以及一份保险计划。

为了排除研究人员流动的阻碍因素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国家的流动性计划，例如奥地利的 APART 程序，丹麦的税收优惠，法国常驻研究学者的非财务奖励（如促进双重职业），靠近法国和瑞士边境的德国大学的职业网络等

等。

这份报告除主题内容外还有补充资料附件，其中包括 38 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简介，50 个优秀案例以及一组“记分卡”，为不同国家在这一主题上的不同立场提供了快速的视觉呈现。

翻译：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2 级张可欣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40926115227742>

## 美国：11 所研究型大学组建大学创新联盟

**United States: New university alliance to boost graduate numbers, save money**

2014 年 9 月，由 11 所美国研究型高校组成的大学创新联盟（简称 UIA）在美国成立，参与学校包括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佐治亚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爱荷华州立大学、普渡大学、中佛罗里达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堪萨斯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和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等。

UIA 旨在为更多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学位，尤其是为首届大学毕业生和低收入的学生



提供学位。如果目标实现的话，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将会增加好几千名，而且还可以节省学生的学习时间，纳税人则可以在教育开支方面节省 1 亿美元，而接下来五年内，从美国高校毕业的学生会再增加 85 万人。这是一桩宏伟的理想，但如果所有步骤都依计划进行，则完全具有可行性。

目前，UIA 的学生总数约有 50 万人，包括大量的首届低收入大学生，这一群体获得学位的人数是最少的，毕业率介于 51% 到 82% 之间。

### 可行方法

作为一个创新团体，UIA 计划创造一系列可行方法，来帮助所有具备不同教育背景的学生毕业。对大学来说，这意味着它们会花费更少的时间来制定不可行的战略方针，对学生来说这意味着学校会更加努力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并且降低取得学位的成本。

UIA 的章程介绍表明，尽管大学教育的价值很明显，但在培养大学毕业生方面，美国第一次面临着失去领头羊地位的危险，而这让人

们开始担心美国的未来繁荣程度以及千百万美国人民的经济机动能力。

UIA 的章程介绍表明，尽管大学教育的价值很明显，但在培养大学毕业生方面，美国第一次面临着失去领头羊地位的危险，而这让人们开始担心美国的未来繁荣程度以及千百万美国人民的社会流动能力。

据估计，到 2018 年为止，美国有 63% 的工作要求员工受过大学教育，比现在美国具有大学文凭的员工数量还要多 2200 万。而美国现在只能培养出 1900 万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

UIA 认为虽然很多高等教育机构都已经在研究并试点创新型的解决方案，但直到目前为止，许多解决方案都价格昂贵，而且本质上都在互相模仿，各高校并没有互相分享它们重要的经验教训。为此，UIA 会采取一个全新的措施，通过各高校合作检验解决方案的效果，并分享成果，各高校可以互相分享并得知哪些解决方案有效，哪些无效。

该创新联盟得到了六大主要赞助商的支持，包括福特基金会、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还有 570 多万美元的赞助资金投入到了薪水和数据分析中，UIA 的高校成员借此可以互相学习，研究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可行的脚本。

预期的结果是乐观的，而且预计学士学位

奖学金的数量在 10 年内会增加将近 5%，每年会有 3300 多个学士学位获得奖学金，低收入学生尤为受益。如果这一例子能够让其它高等教育也实现类似的效果，每年将会多产生 4 万余个学位。按照预计，转学生保留率和进步率也会有所上升，其中 10 年内，低收入转学生的保留率会上升 1.8%，进步率会上升 2.4%。

### 首项合作计划

UIA 的首项合作计划包括预估分析，比如说佐治亚州立大学的导师制度。通过导师制度，佐治亚州立大学的学期保留率提高了 5%，而毕业生获得学位的时间减少了几近半个学期。这意味着每年会新增 1200 名在校的学生，而佐治亚州立大学的 2014 年毕业生，比起上一届学生，节省了 1 千万美元的学杂费。而佐治亚州的纳税人，则节省了 5 百万用于支持公共教育的税款。

UIA 在预估分析中称：“如果同样的创新方案在 UIA 的 11 个教育机构里实施，并取得相似的结果，那 UIA 的 19000 多名在读学生每年可以节省将近 2 亿美元的学杂费。纳税人在教育方面也能节省 1 亿美元的税款。接下来五年内，这些创新方案会让 UIA 的教育机构培养出额外的 61000 名大学毕业生，为学生和纳税人节省 15 亿美元的教育开支。如果这些

创新方案能够在全国的公立高校里实施，则有可能每年帮助另外 33.5 万学生留在大学里，从而每年为学生节约 22 亿学杂费，为纳税人节省 14 亿税款。接下来五年里，单是这一计划就可以让美国的公立大学多培养出 85 万大学毕业生，在总共的教育开支上节省 180 亿美元。”

UIA 并无计划扩大其高校成员的数量。UIA 称：“随着我们取得更大的进步，其它的高等教育领导者和教育机构也许也会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想要向我们学习。虽然 UIA 暂时不会扩充成员数量，但是我们可能会邀请有能力的校长、高校学科带头人等参与我们的工作。”

翻译：2013 级翻译硕士张勿扬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40917165340133>

~~~~~

### 高校推动对学术工作者参与社区活动的奖励政策

#### Rewarding academics for civic engagement gains ground

以学者与社会开展互动的眼光来看，在世



界高等教育领域中，走出象牙塔，参加社区活动的学术工作者数量正不断在增加，大学也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鼓励他们参与社区活动行为。不过实现了这一奖励政策的学校仍旧占少数，其理由则十分复杂。

近日，美国专攻民主理论的独立研究员克莱尔·辛德尔·霍采访了40名参与社区活动的学术工作者，大多数受访者都来自美国。在受访者中，有14位完全没有受到工作奖励，而另外22位“由于能够将社区活动与教学、研究或是他们所在机构的职位相融合而得到了一些普遍性的机构奖励”。只有四位受访者因为参与社区工作这一单独活动而获得嘉奖。

而来自高校高层的观点也证实了这一现象。塔卢瓦尔工作网的项目研究部主任罗乐妮·霍伊特在过去两年中，采访了大约来自20个不同国家的40位大学校长或其代理人，向他们询问了对学术工作和社区活动的奖励措施的相关情况。

她说：“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社区活动在他们是享有优先奖励权的，但是他们说虽

然想法是这样，但并没有付诸行动。40个人中，只有一两个人能够说出在奖励社区活动方面，学校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 奖励种类繁多

各高校在奖励从事社区工作的学者方面，采取了多种多样，或直接或间接的方法。辛德尔·霍说：“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为教员们提供一些空间来做社区工作，而不是将社区工作置于日常职责之上。”比如说，有些学者将参与社区活动作为研究的重心，而有些学者则接到指令，专门开设一门课，让学生有机会去做社区工作，或者讲课人会在教室里故意采取一些方法让学生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比如说让学生针对一个流行的话题进行公开辩论。

而对于一些较为年轻的大学来说，比如靠近加纳的阿克拉的阿舍西大学，学者的工作描述里直接写明了社区活动这一部分工作内容。该大学校长派特克·阿午阿说：“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将这类活动和学术活动分开来看，社区活动是我们课程的一部分。”

而在一些历史较为悠久的大学里，高层所作出的改变会为社区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麦可思·普莱斯2008年成为南非开普敦大学的副校长时，介绍了四项新政策，旨在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缓解贫困、提升公平、加强

安全、打击暴力行为、促进非洲发展，这些政策在五年内有 1800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开普敦大学机构规划部社会反馈局的主任桑瓦波·尼格科万说：“这四项政策鼓励了许多小项目的开展，或是鼓励让这些项目做得更大。”

大学校长们也许还在更小的方面采取了行动，想要鼓励学者们参与社区活动。辛德尔·霍说：“校长们通常会有一些能够自由使用的资金，他们用此来资助小项目的开展，也许还会用此来投资一些项目，告诉整所大学这些项目就是他们想要鼓励开展的。”

间接支持社区活动的例子还包括学校会给学者们一些小小的资助，比如说为他们报销旅费，这样学者就可以参与一些大型活动或者社团组织。辛德尔·霍说：“根据我的经验，教员们可以从社区活动中获得极大的个人满足感，所以哪怕机构只给一点点资助也是行得通的。”

### 奖金奖励

有些大学还会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承认并嘉奖参与社区活动的学者。比如说南非的文达大学就为杰出的实践型学者设立了机构奖金。这也是美国流行的做法，而这种奖金通常都是副校长给予的。霍伊特说：“这种奖金授予的不仅仅是荣誉，还会为职工的简历增色，便于他们晋升。”

美国的其它一些大学，比如说宾夕法尼亚大学还设立了特殊的奖金。宾大两年制的穆尔曼 - 西蒙项目（Moorman-Simon Program）允许学者们在他们两年的任期内少教一门课。霍伊特说：“这种方法同样也是对花时间做社区工作的学者的承认，毕竟和社区居民打交道也是需要花费时间的。”

位于智利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大学，其公共政策中心将直接和间接方法结合在一起，鼓励学者加入到公共政策辩论中。每年该中心都会举行一个调研比赛，邀请学者撰写与公众生活问题相关的公共政策或意见书。中心主任伊格纳西尔·伊拉拉匝瓦尔说：“他们写的并不是普通的研究论文，我们要求他们想一想，政府要怎么做才能提高现行政策的效果。”接受邀请的学者会获得 1 万美元的资助来撰写长达 25 页的议案，或者获得 2000 美元的资助来撰写短篇意见书。

该中心还会组织一系列工作站和研讨会来公布这些议案。伊拉拉匝瓦尔认为公共政策中心的这一方法能够降低学者参与公共政策事务的交易成本。他说：“我们可能面临学生在街上游行，抱怨教育质量，而我们的教授们正躲在大学里面写论文的尴尬。所以我告诉教授们，我会举办一个研讨会，让你的建议被执政者听到，我也会把你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这都是

为了让教授们建立威望，并且让他们的工作变得公开透明。”

该中心还成功说服学校的管理层，将学者们撰写的政策论文放进学生的学术课程里。伊拉拉匝瓦尔说：“这样一来，这些论文就算没有像常规的学术论文那样得到重视，也能够得到学校的承认。而且这也算是传递了一条讯息，表明学校是重视这项工作的。”

开普敦大学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2010年以来，开普敦大学的学者可以通过参与社会活动来得分晋升或是加薪。

### 为什么实行奖励这么难？

如果说有这么多不同的可行性奖励方法，为什么世界上其它大学认为要奖励社区活动这么难呢？

霍伊特认为，一个简答的解释就是大学是一类变革速度相对缓慢的机构。她说：“哪怕是在像南非或者墨西哥这种国家法律公开鼓励大学参与社区活动的国家，大学所作出的反应还是很慢。”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大学在学生、职工和资源这三方面的竞争输赢，主要取决于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世界排名情况。伊拉拉匝瓦尔对此表示：“我们有学者被任命为总统委员会的成员，来解决智利的能源问题。他们为

此辛苦工作，但回到学校后，系主任只想看看他们就此问题写了什么样的论文。”美国达顿凯特林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德里克·巴尔克也说：“社区活动现在还处于课程的边缘地带。我们奖励职工的传统做法，是通过互相评论发表的论文来进行，所以要求学者将社区活动当回事，认为这个也应该得到奖励，不是件容易事。”

学者们自己也同样对此很在意。霍伊特说：“大多数学者接受的训练都是把研究和教学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们缺乏对社区活动的训练和洞察力，对社区活动的奖励并不是一项严格的奖励项目，这就意味着就算学校支持社区活动，学者自己可能也会反对。”

### 如何评估社区活动参与度

将社区活动参与度与研究、教学并列在一起，成为评价学者业绩的指标，看上去是很有希望的，但像智利的天主教大学和南非的开普敦大学这样的高校发现，这么做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如何评估学者的社区活动参与度，是一项新鲜的尝试，所以学者们可能没有经验，不知道要怎样正确表达自己取得的成就。同样，对他们进行评估的同事可能也没有对此作出评估的经验。这些评价者可能需要包括来自校外的实践者，而



尼格科万说：“但很多学者可能不会愿意接受校外人士的评估，他们会觉得校外人士不够权威，无法判断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的质量。”

而奖金，从本质上来说，种类繁多，可以包括很多业绩，比如说和沿海的贫困社区一起工作来管理渔业，为议会委员会提供专家建议等。而且，从定义上来说，实际生活中的工作条件，和学校实验室里的消毒条件相去甚远。

而且，社区活动参与度的结果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甚至是不可衡量的。这些都意味着要将对学者参与社区活动的评估方法限定在现有的评估框架里是很难的。这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评估社区活动参与度。

尼格科万给出了皮尔·德·沃斯的例子。沃斯是开普敦大学的法律专业教授，也是南非最受欢迎的博客撰写人之一，他对法制问题的评论吸引了 25000 名读者。尼格科万说：“他以非学术的形式为普通大众写作。他就是一位我们当地的教授，在用他的学术知识和大众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但是你怎么去衡量这一活动的价值呢？”

霍伊特说：“当我们和大学校长说时，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评估社区活动参与度？我们怎么能够区分出哪些活动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没有价值的呢？社区活动不像实验室里的

环境，你不能控制条件，所以比方说，如果你当地的失业率下降了，你不能确定这到底是因为你的项目取得了效果，还是由于别的一些不相关的原因。”

开普敦大学正在研究一套系统来评估学术活动，他们是在美国的卡耐基基金会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或者英国的杰出研究制度基础上进行修改的。现在这一评估系统还处于试验阶段，其理念是要通过在不久的未来试点以测验该系统是否行得通，但是尼格科万相信这一系统会成为非常有用的资源。

显然，高等教育在这一领域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过有些大学奖励参与社区活动的学者的措施，已经开始见到成果了。

翻译：2013 级翻译硕士张勿扬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4091807261155>

~~~~~

### 芝加哥大学形成新合作伙伴关系以帮助当地居民就业

#### University of Chicago forms new partnerships to support local hiring

根据 2014 年芝加哥大学当地劳动力会议

上公布的数据,芝加哥大学今年支付给国库 2.3 亿余美元,以提高芝加哥中南部地区居民的收入。芝加哥中南部地区居民的数量占据了芝加哥大学员工和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员工数量的三分之一。

该劳动力会议和对就业率影响数据的报告标志着芝加哥大学当地计划的第二阶段开始施行,这一计划于 2014 年 3 月由居民就业局发起,旨在帮助芝加哥中南部地区发展经济,该计划的第一阶段主要支持当地的商业发展。

芝加哥大学在主校区和医学中心都付出了重大努力,来帮助当地的求职者,并据此发布了报告。63% 以上的芝加哥大学员工住在芝加哥城内,其总工资和在当地经济中的投资总额将近 5.8 亿美元。这一数据还没有包括芝加哥大学的教员。

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季默说:“芝加哥大学承诺要和周围的社区以及芝加哥市的各个组织共同合作以增加发展经济的机会。芝加哥大学作为芝加哥市主要的雇主,也是南部地区最大的雇主,我们会继续支持经济增长,并帮助寻找和准备新的人才资源,让他们在校园里担当重要角色,或是在和当地的商业合作伙伴的共同工作中担当重要角色。”

通过芝加哥大学当地计划,居民就业局与



两个芝加哥的非营利组织(芝加哥工作委员会和 741 协会),形成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力求帮助劳动力发展部门更好地为当地的求职者服务。如今的劳动力会议,是在芝加哥工作委员会和大礼堂的共同合作下完成的,致力于将劳动力发展部门的政策执行者和学者聚集一堂,讨论全国劳动力形势的发展趋势与芝加哥的劳动力发展问题有着怎样的联系。

艾伦·强森是芝加哥工作委员会的培训项目“关注前线”的主管,他说:“芝加哥工作委员会也是反对贫困的,所以我们很希望和芝加哥大学一起合作完成这一激动人心的培训项目。加强劳动力发展提供者的能力,不仅仅会提高为低收入工作者和边缘求职者的服务质量,还会保证雇主能够拥有高质量的备选员工。”

芝加哥大学和 741 协会(10 家劳动力发展机构的联盟)的新合作伙伴关系,将向后者提供在芝加哥大学和医学中心的就业机会信息以及联络服务。芝加哥大学还会帮助 741 协会的成员与他们的雇主以及其他中南部地区的雇

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雇用两名芝加哥大学实习生来协助他们的工作。

安德鲁·凯勒穆是 741 协会的临时执行官，他说：“芝加哥大学对由我们的合作伙伴服务的社区居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求职机会来源，也能够在我们的合作伙伴与其他雇主之间架起桥梁。这一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会给我们的机构和当地的求职者更多的机会，同时为当地雇主提供可靠的高质量候选员工。”

理查德·艾利欧是芝加哥大学分管人力资源的副校长，他补充说：“人力资本对促进大学完成任务，构建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自己的后院里有着强大的资源，而这些新的努力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接近和影响当地的有才之士。”

芝加哥大学当地计划关注的重点对象是道格拉斯、大林荫道、大渡河、海德公园、肯伍德、奥克兰、华盛顿公园、伍德朗和南岸中南部的社区。

分管居民就业的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德雷克·道格拉斯说：“芝加哥大学承诺要支持发展强大的社区，而当地居民的就业率就在这一承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芝加哥大学当地劳动力会议是我们和地区劳动力发展部门合作伙伴关系的延伸，旨在帮助当地居民的就业，同时在行业专长和大学奖学金二者

取得平衡，以促进芝加哥市内各劳动力行业之间的对话。”

翻译：2013 级翻译硕士张勿扬

<http://news.uchicago.edu/article/2014/08/22/university-chicago-forms-new-partnerships-support-local-hiring>

~~~~~

### 斯坦福大学设立健康网站，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健康资源及社区帮助 Wellness Network at Stanford connects students to mental health and wellness resources and communities of support

要帮助学生在斯坦福大学健康成长，其中有一项就是要将他们与职工、项目和相关服务的网站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在学生面临生活中的个人困难和学业挑战时为他们提供帮助。

这种联系现在处于斯坦福大学新的在线资源目录的中心——斯坦福健康网站是一个综合性的搜索型网站，可以为学生提供即时的紧急状况服务、职业咨询、学术支持、社区中心和学生社团服务。这一在线目录收录了 150 多项资源，展现了校园里可用的精神健康服务和身体健康服务的范围。还有一些精挑细选的校外项目资源也包括在内。



学生精神和身体健康是斯坦福大学长期以来优先关注的重点。多年以来，许多校园部门，比如心理咨询服务处和宗教生活局，都研发了专门的资源和专长来帮助学生处理他们在课堂内外面临的挑战。该健康网站旨在将所有的这些资源集合在一起，这样学生和其他相关人士就可以更加方便地各取所需。

健康网站的资源来源于学生、教员和职工输入的信息，该网站允许访问者浏览针对于四种不同对象的资源信息，这四类对象是本科生、研究生、教员职工和家属朋友。这一网站由学生事务副教务长办公室资助，展示了学生和其他人士可以获取的最为广阔且安全的资源。

管理学生事务的副教务长格里格·博德曼说：“斯坦福大学的教员、职工和学生已经共同合作了很多年，来解决复杂的学生健康问题。我很高兴可以说我们已经成立了健康网站，并且我衷心希望整个校园都能广泛使用这个网站。”

支持学生的学术、职业和社交能力的发展，

需要多层次的，注重整体性的方法。最近，精神和身体健康咨询董事会推荐了这一综合性的在线资源目录，该董事会有两名主席，分别是学生事务副教务长助理萨利·迪金森和心理咨询服务处主任朗·奥布彻尔。

博德曼说：“这个健康网站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大骄傲，证明我们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方法，为学生和社区构建一个安全、健康和充满爱心的校园环境。”

翻译：2013 级翻译硕士张勿扬

<http://news.stanford.edu/news/2014/september/students-wellness-network-092414.html>

## 亚洲网络学习市场规模大幅增长 Huge growth in eLearning in Asia, market report says

根据近期一项关于网络学习的市场调查报告，在线高等教育的注册数的大幅增长，教学内容数码化的快速发展，全国性在线教育网络的出现，以及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教师短缺，都表明亚洲各国针对网络学习产品的需求十分旺盛。

国际研究机构 Ambient Insight 的一项调

查显示，2013年，全球范围内“学生自订进度”（self-paced eLearning）的网络学习产品市场总额高达427亿美元，而且预期将在2018年达到530亿元。

尽管美国在此市场中占最大份额，亚洲作为第二大市场也不可小觑。这项调查预计，到2018年，亚洲从网络学习产品中获得的收益将从2013年的79亿美元增长到121亿美元。

在全球网络学习市场增长最快的十个国家中，亚洲就占了七个。其中包括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和巴基斯坦。调查显示这些国家的市场增长率都超过了30%。Ambient Insight调查部的负责人山姆·阿德金斯补充道：“缅甸的网络学习市场增长率高达50.2%，位居亚洲第一。泰国和马来西亚分别以43.7%和42.3%的增长率名列第二第三名。”

这项调查还推测，在21个受调查的亚洲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相关收益增长将翻两倍以上，9个国家的收益甚至将翻三倍以上。而私人投资进入网络学习市场是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亚洲国家以外，非洲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欧洲国家如斯洛伐克的网络学习市场也有大幅增长。非洲甚至被描绘成世界上最有发展潜力的网络学习市场。

在早前关于非洲的一项报告中，Ambient Insight表示其已经彻底改变了之前对非洲大部分国家的预测。因为根据分析，非洲在网络市场中的收益将从2013年的3.55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7.58亿美元，增长率超过200%。

《2013-2018年自定进度网络学习市场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过去，自定进度网络学习产品只在发达国家有较高需求，但随着网络学习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推广和新用户的不断增长，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学习‘生态系统’正在出现。”

### 对象：高等教育领域

网络教育服务的主要购买者有政府机构、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商务人士和个人消费者。不难看出，消费主要集中在学术领域。阿德金斯表示：“私人 and 公共学术机构购买了大量商业网络教育内容。”

报告指出：“网络学习在亚洲的快速推广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不少在线教育机构都已经拥有了大量在线学员，而且学员数量还在不断增长当中。”如中国的弘成教育集团（ChinaEdu）就已经拥有31.1万在线学员，这些学员既有来自学位项目的，也有来自非学位项目的。目前弘成教育集团的学员人数

已经仅次于美国的“凤凰城大学在线”（the University of Phoenix Online）了。

2013年11月，弘成教育集团宣布，其学位项目的学员人数已经达到21.1万，比上年增长了14.5%。此外，韩国国立开放大学（Korea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也已经拥有20万名在线学员，如果按学生数量计算，它是韩国最大的大学。据悉，到2014年9月，韩国已经有24所网络大学正在运行当中。马来西亚的开放大学也有9万名学员，而日本开放大学更是以8.5万名学生的规模名列日本在线教育提供者的榜首。

### 平台：国家鼓励建设

报告进一步指出，近期许多亚洲国家都通过了相关法律，推进高等教育采用网上教学方式。比如，2012年初，日本政府就通过了关于远程教育大学的法案，要求54所大学和11所远程教育专科学院提供网络学习项目。

“这一举措使得日本网络学习参与者大幅增长。”报告评论道。到2014年6月，超过30万名日本高校学生参加过网络课堂学习。而到2014年，中国的68所大学也专门建立了负责网络学习的部门。

政府对于第二类和第三类教育的支持极大促进了网络课堂的崛起，这些支持包括建



立高速网络的创举。这些创举包括新加坡政府的“新加坡未来学校”（Futureschools@Singapore）项目，孟加拉国的“数字孟加拉”（Digital Bangladesh）项目和印度尼西亚的“知识社会2025”（Knowledge-based Society 2025）项目。其中“数字孟加拉”项目计划在2021年之前为孟加拉国所有大学、学院和学校提供3G无线网络。

此外，为了辅助学校的网络学习平台，马来西亚一项新的全国性网络学习政策提出目标：到2015年，马来西亚将在线提供30%的高等教育课程。

2011年5月，斯里兰卡高等教育部签署了一项协议，将通过全国在线远程教育服务（the National Online Distance Education Service, NODES），将移动网络终端作为全国性的高等教育学习平台。2014年6月，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大学为斯里兰卡的政府工作人员开设了

7 个网络学位项目。

### 内容：逐渐电子化

早在几年前，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了学术内容的电子化项目，而且报告也表明：“现在（项目）已经进入了后期阶段”。包括中国和韩国的大规模项目，初等学校和高等教育都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

根据本次报告，在前期的具体成果的基础上，发达国家的内容电子化项目已经进行到后期阶段。然而，泰国和越南还停留在非常早期的教学技术上，而其他国家如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关注点也还在电子化的第一阶段上。

报告还指出，网络课程——尤其是英语学习课程——的发展，促进了新的国家政策出台。而且“对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性的网络学习技术市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政府对提高英语学习效率所进行的努力明确展示出相关电子课件开发的巨大市场”。

而这种提高英语水平和网络教育水平的努力，其主要诱因正是 2015 年 11 月计划启动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经济团体——矿石原子能委员会（ore AEC）。据悉，该委员会成员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政府机构和公司争先恐后地要求他

们的雇员精通英语，同时，个人也希望利用矿石原子能委员会，通过提高英语水平来获得其他国家的良好工作机会，”

翻译：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2 级张伊妍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40925164018658>

~~~~~

### 卢旺达卡耐基梅隆大学 IT 专业首批学生毕业

#### Rwanda: First Batch of IT Students Graduate From Rwanda'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今年 7 月，卡耐基梅隆大学宣布了其在非洲设立的首个硕士学位项目第一批学生的结业，学生不仅来自卢旺达，而且来自整个非洲。每名毕业生都取得了信息技术（IT）专业的硕士学位。

“毕业班中的年轻男女学生都已做好进军企业界的准备。他们拥有在东非和世界 IT 行业中脱颖而出的潜力，我们对此很兴奋。”卡内基梅隆工程大学的院长詹姆斯·加略特说道。

该项目的缘起可以追溯到 2005 年在突尼斯举办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SIS）。在会



上国际电信联盟（ITU）被任命为多个工作项目的协调人，其使命之一是，到 2015 年，将那些不在世界网络中的人民联系起来。

在 2005 年，。它的一部分使命即是获得在 2015 年能够让“未联系的人们联系起来”的契机。在此背景下，人们积极酝酿新的项目，以填平数字鸿沟。这项努力推动了五个卓越中心（Centres of Excellence）的成立，以便为非洲大陆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所需的科学与技术人才。卢旺达政府把握这一机遇，策略性的瞄准卡耐基梅隆大学（CMU）开展合作，在该国设立一个硕士学位项目。这也使卡耐基梅隆大学成为首个在非洲设立由教员全职教学、提供硕士学位项目的美国大学。

“设立在东非是了解这个地区的技术需求的唯一方法，”东非 - 卡耐基梅隆大学创始主任布鲁斯·科隆说道，“创设一个长期性的教育项目相当关键，因为它能让学生拥有在当前背景下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的时间。”

卡耐基梅隆大学（CMU）是一所全球性研究型大学，拥有 12000 多名学生，95000 多

名校友和 5000 多名教职工。自 1900 年创立之后，该校就成为了创新精神的诞生地。

“学生选择留在东非而非美国或其他地方进行学习，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非洲最好的学生纷纷前往国外求学两年，那将会带来许多问题。”科隆说。

翻译：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2 级甘兰蕙子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407280215.html>

~~~~~

### 印度大学排名将包含社会贡献指标 National University Rankings to Include Social Contribution (India)

在上周在印度钦奈举行的印度理工学院首脑会议上，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斯迈里提·伊兰尼宣布，印度的知名理工学院（IIT）将创立一种新的大学排名制度，即便这些学院并不算大学，也将设立相关的参数。

伊兰尼已与中央大学、理工学院以及印度管理学院的首脑进行多次会议，探讨如何制订一个全国性的排名体系。该体系既能够鼓励这些高等学府研究印度发展问题，在重大事件上为政府建言献策，同时也能为国际组织提供咨询工作。



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在上月与理工学院董事及管理层的会议上曾表示，尽管全球排名具有重要性，“我们应该设立自己的排名标准，作为内在的改革发展机制。”一名熟悉会议内容的政府官员称，这将比通常国际排名——注入上海交通大学、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和 QS 机构所提供的排名——所关注的指标，如国际学生数量、国际研究合作程度和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和被引用的数量，更适合印度的高等教育机构。

“大学的社会责任将被列入考察范围，”这名官员称。相应的，政府将增进对于大学行使社会和政策角色的资金鼓励，这也将被纳入排名标准中。

9月22日，全体16所理工学院的首脑开会并制订了时间表，称印度的理工学院将与政府部门和大学首脑一起制订这一全国性排名标准。

数名中央大学副校长、理工学院董事以及高级部员在八月的全国性排名标准研讨会上成立了委员会以监督整个进程。

“我们的排名系统将首先用于衡量印度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理工学院，中央大学和州立大学。在12月我们将有一个初步的模版，此后我们将与股东进行协商以发布排名。”人力资源发展部高等教育秘书阿舒克·查库尔称。

坎普尔理工学院和马德拉斯理工学院将率先尝试这种排名。“理工学院与排名机构展开了密切合作，在明年三月，他们将提出草案。”查库尔说道。

### 相关性有待加强的现有指标

坎普尔理工学院管理层主席阿南达克里什南表示，国际排名机构使用的指标并不完全适合印度大学。

“有些人认为，权威排名的标准与印度的高等教育机构并不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相反，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一些指标，设置印度特有的排名系统，同时推进印度高等学府特有的国际化是很有必要的。”英国文化协会的英德拉尼·高什在最近的博客中写道。

印度官员表示，经过检验，现有排名机构的指标被认为与印度的大学教学具有较弱的相关性。

理工学院是目前唯一出现在国际排名中的印度高等学府，但是作为专业化的技术性学校，它们很少从事研究工作。除了具备高淘汰率和具有影响力的领导层校友外，它很难在世界前200名的排名中给人留下印象。

理工学院“不具备这种排名系统所基于的大学的特征”，阿南达克里什南说道。

更广泛的来讲，帮助更多社会背景的人获

得高等教育，包括残疾人群体、部落和低种姓的人，这一点都不被国际排名系统所考虑，查库尔说道。

印度大学在诸如外国职员和留学生的比例等指标上表现平平。尽管这两项指标在大多数国际排名系统中都占较低比重，世界前 200 名的大学吸引了大量留学生和外国教职工，使他们的文献引用率和海外交流表现得到提升。

“我们会采纳一些国际指标，比如教职工与学生比例，文献发表和引用，但我们着重关注的还是如行业合作程度、社会发展等与李工序元和公里高等学府密切相关的指标。”阿南德克里什南表示，他曾安娜大学（一所清奈的理工学院）的副校长。

尽管如此，政府官员仍然表示，国际排名仍然具有重要性，国际学生与教职工交流有助于吸引国际研究基金。

### 数据采集

印度独有的排名系统将是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官员表示，需要核对在研究、资源配置、专利申请、咨询工作和其他方面的数据，这些工作通常是由国际排名机构来处理的。

德里理工大学已经组成了委员会协助进行国际排名工作，以保证经过核实的数据满足一个高的标准。



“在这些排名研讨会中，我们了解到，许多大学和高等学府并不知晓如何在表各种列举他们的优势；有些机构并不明白哪些内容需要强调。”查库尔在研讨会后告诉本地媒体。

比如，理工学院所进行的研究“并没有在媒体上得到充分报道”，查库尔表示，同时也表示，将咨询国际排名机构的专家来增进对指标的了解。

“印度大学一般被认为是教学型而非研究型大学，但是现在对于大学和其他高等学府来说，较好地呈现数据来增加进入国际顶尖排名的机率迫在眉睫。”查库尔说。

八月在孟买举行了 13 名印度管理学院院长的会议上，伊兰尼部长也要求管理学院来提出一个排名的草案，兼顾国际排名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这将有助于国内的高等学府为满足全国性排名标准草案的要求而在学术造诣上取得进展。”她说。

## 国际化

一方面，印度致力于将资源用于教育国民，改进渠道，提升高等教育入学率，另一方面，政府也倾向于在不穷尽稀有资源的前提下建立国际合作。

9月12-13日在昌迪加尔召开的39名中央大学副校长参与的会议上，伊兰尼讨论了适合印度大学的国际化策略，包括学术合作，教职工与学生交流，以提升在国际排名中的位次。

政府官员表示，将考虑副校长在如何提高愿就学的外国学生比例的建议。为国际学生提供专门住处已经作为一项重要的举措付诸实践。

针对衡量研究成果并保证更多研究论文的发表，这些大学也将被要求提出自己的策略计划。

理工学院已经逐渐参与了更多的国际合作。莫迪总理表示，他将利用本周内访问美国的机会，来讨论计划成立的新的理工学院的国际支持。（在他7月制订的2014-15年度首个预算中宣布了五所理工学院的建设。）

有关官员表示，即将建设的果阿理工学院将与尚未确定的美国机构进行合作。伊兰尼将陪同莫迪总理在美国反对访问，以签订联合声明。届时其他理工学院的合作国家也将被宣布。

理工学院委员会会议也宣布了一项新的全球首创学术网络计划（Global Initiative for Academic Networks, GIAN），全球1000所顶级学府的教职工、研究人员将首要参观印度理工学院，并激励年轻人参与科研。

翻译：新闻与传播学院2012级甘兰蕙子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40925065118978>

## 2015年后欧洲对非洲高等教育援助初具雏形

### Post-2015 European Support to African HE Taking Shape

2015年后，欧盟的新的泛非计划将被用于扩大和加深它的“调谐非洲”计划的覆盖面，以及推广一个新的倡议，倡导更广泛地支持非洲的质量保证和合格鉴定。

后者的构思基于对一个和谐的质检系统在非洲发展的支持。它以在培养注重质量的机构文化，并对泛非质量保证体系的贯彻实施予以保障。

这是于2014年9月15-19日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召开的第六届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



证国际大会所讨论的主题之一。

欧盟也将支援质量保证体系中的容量建设，这被所有与会团体都认为是非洲学界最紧要的需求。

潜在的目标是维持泛非质量保证体系现有的稳健的发展趋势。

项目活动将参考对于泛非质量保证体系草案的研究结果。

这项研究由非盟与欧盟联合委托尼日利亚的皮特·欧克布克拉与比利时人巴特·冯特伊开展。皮特在布琼布拉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两人此项洲际合作草案的可能涉及和实用意义方面进行了研究。布琼布拉会议上得到的反馈将被整合进入报告中，报告的最终版本将

与 2015 年埃塞俄比亚首都阿迪斯阿布巴举行的会议上正式生效。

最先开展的“调谐非洲”项目为 2011 年启动的非洲高等教育调谐项目。

该项目由于在跨国合作、改进高等教育课程相关性工作采用实用性强的方法，近年来获得了较好的声誉。

非洲的 60 所大学参与了 this 试验性阶段，覆盖了五个大区。试验性阶段将于 11 月的原定于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举行的研讨会上宣布结束，由于埃博拉疫情，会议可能改到坦桑尼亚举行。

在研讨会上，参与调谐项目的大学、区域性组织和合格鉴定机构将对五个大区的联合学位课程进行检测。

2015 年将要启动“调谐非洲”项目的下一阶段，参与的大学总数将为之前的两倍，大区数量将被增至七个。

翻译：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2 级甘兰蕙子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40925091205558>

## 台湾大学与日本京都大学、筑波大学开展校际合作

9月1日，台湾大学由杨泮池校长率包括7位院长、全校共14个领域的120余位教师在内的代表团，赴日本京都大学展开为期两天的“第二届京大台大研讨会”，京都大学直接参与的学者有上百人。开幕式上，台大杨校长、京都大学松元纮校长 (Hiroshi Matsumoto) 表达对此盛会的期待、期许与期勉，两校并藉此场合，正式签订交换教授计划以及双联学位计划。

台湾大学此次赴日代表团规模空前，包括14个领域，有先进防减灾 (Advance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农业 (Agriculture)、生物 (Biology)、电机信息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人文 (Humanities)、法律 (Law)、管理 (Management)、医学 (Medicine)、博物馆 (Museum)、纳米科技 (Nanoscience and Technology)、天灾及全球变迁 (Natural Hazards and Global Change)、公共卫生 (Public Health)、研究发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以及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横跨台大11个学院。

除了学术面上的研讨，两校在学生事务、研究发展等行政面，亦分别有所交流。台大研

发长李芳仁教授、副研发长胡文聪教授及产学合作总中心副主任康仕仲教授，则与京大相关单位，针对技转与创新、智财权管理等，进行相互探讨；同时亦前往物质细胞统合系统所 (Institute for Integrated Cell-Material Sciences, iCeMS) 参观实验室及研究室，陈良基副校长加入第二天活动并聆听京大国际化战略中很重要的一项“白眉计划” (Hakubi Project, 又称“次世代研究者育成支持事业”)。

京都大学为台大姐妹校。两校教师间互访交流频繁，自2006年起，于生物相关领域开始远距教学的合作，至今不辍；也在同一年，两校陆续于校级、生物资源暨农学、生命科学、医学等推行学生交换计划。预计在未来一年内，两校将落实教授交换计划，以及管理学院的硕士双联学位计划。

紧随其后，9月28-30日，台大杨泮池校长再次率团前往日本参与筑波全球科学周活动 (Tsukuba Global Science Week; <http://ura.sec.tsukuba.ac.jp/TGSW2014/>)，行程包含9月28及29日两天的“第二届筑波大学与台湾大学联合教员研究交流会议”、9月28日举行的首个在日本设立的“台湾大学计划办公室”之揭牌与剪彩典礼、9月26及27日的“第十三届台湾大学、京都大学与筑波大学联合小型研讨会”、9月30号的“生命科学卫星会议 (Life

Science Satellite Meeting) ”、实地参与 10 月 1 日的台湾、京都与筑波大学远距课程，并计划参访日本国家级与筑波大学的研究与资源中心等活动。

第二届联合研讨会承袭上次会议主题（协作合作、策略联盟与美好未来 II, Synergy, Alliance and a Better Future II），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各领域共同激发出多元的实质合作、行动方案。为此，由杨泮池校长率领 7 学院 22 位教师加上 14 位本校各院优秀学生与会。9 月 28 日上午筑波全球科学周的开幕，杨校长获邀，针对台湾的转译医学研究与精准的癌症治疗（Translational Research and Precision Cancer Therapy in Taiwan）发表演讲，深获海外专家的好评。

筑波大学为台大姐妹校，自 2009 年起，两校教师、学生间远距教学、共同研讨会、暑期教育研习、学术互访、科学交流等教育与研究合作频繁，尤其是生物相关领域的合作；2011 年，两校于校级、生物农学、生命科学、医学与牙医学等推行学生交换计划、签立双学位学程合约计划（Dual-degree Program），已有三

位学生修习。多年来，两校密切且扎实的发展多项科学研究合作，并在 2013 年共同发表优秀成果于顶尖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今年，台大与筑波的第一位双硕士 - 牙医专业学院戴佩涵同学，业已于七月取得双学位，为两校教育合作写下新的一页。

筑波大学为台大学术交流主要合作学校之一。经多次沟通、多年的努力与交流成果，今年五月，筑波大学更进一步于申请 Super G30 计划时（已于 9 月 26 日获得，共十年补助），将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与法国波尔多大学定为三大重点学校，预计于未来三年内，四校将落实无校园边界的点唱机学程（Campus in Campus “Jukebox” Program），并将就“粮安与食安（Food Security）”、“计时生医（Chrono-Biomedicine）”及“健康创新（Health Innovation）”三大领域以推动全球创新联学位计划（Global Innovation Joint Degree Program）、配合双学位计划与点唱机学程。目前两校已有远距教学、双学位研究所学程（两名博士生与一名硕士生修习）、联合研讨会等多项交流。

## 全球大学毕业生力不胜任工作要求的现象不断增加

### Around the World, the 'Skills Mismatch' Between Graduates and Jobs Is Growing

近年来，全球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增长，但他们与工作要求之间的“能力不匹配”也在不断扩大。获得一个学位不再意味着是找到好工作的保障，大学因此面临众多指责，因为大学教育没能使学生充分适应雇主的期望，为步入社会做好准备。

大学采用“象牙塔”式的教学已经日渐成为一个问题。但同时，根据“塔鲁瓦网络”（Talloires Network）的项目主管艾米·纽克姆·罗的说法：“也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规模项目，这些项目由大学和社区合作举办，大大提高了年轻人的就业能力。”“塔鲁瓦网络”旗下的“青年经济参与计划”（Youth Economic Participation Initiative, YEPI）专注于青年失业问题。

而这个话题也会成为 2014 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在南非举办塔鲁瓦网络领袖大会的主要议题。艾米·纽克姆·罗表示，这个议题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受其他组织影响的发展中经济体中找到就业的原动力。“青年经济参与计划”的一大目标就是“检验并改进”一大批高校主导的帮助毕业生转化为劳动力的项目。“当与教

育界人士对话之后，我们就很明显地发现正式的大学教育很少关注就业市场。”万事达信用卡首席执行官瑞塔·罗伊表示，“各大经济体都努力发展自身，而雇佣者们也会到那里进行招聘。但有大量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蓬勃发展的新行业。”据悉，万事达信用卡基金会是“青年经济参与计划”的赞助商之一。即使是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如工程师）也需要学习额外的技能才能满足雇佣者的需求。

### “社会工程师”

“过去，成为公务员是很多毕业生的目标，但大部分时候这只是一个梦。”水与环境工程国际机构的创业孵化区（简称 2iE）副主管艾洛德·汉尼夫提到，“而今天，大部分学生的志愿是为非洲的大型跨国公司工作。这些公司希望聘请的不仅仅是专业的工程师，还有那些具有领袖气质，能够管理一个团队的人。”

位于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的 2iE 是“青年经济参与计划”的合作机构，它正在吸引非洲 24 个国家工程专业的学生的关注。2iE 为学生提供了提高社会企业家能力训练的必修项目，并且正在推广到西非其他机构的毕业生。而这一切都是由“青年经济参与计划”资助的。

汉尼夫举例说，他们希望一位工程专业的硕士毕业生最终能够管理一支负责工程、能源

或水资源项目的队伍。“目前的问题在于，让这些劳动力接受实战训练需要高昂的花费，因此大部分西非的大学只提供理论课程，但这并不能满足企业们的需求。”她说。而 2iE 通过实习、田野调查和其他实践机会为毕业生们提供了与实际工作相关的训练。

“我们会向企业了解他们不断变化的需求。非洲革新速度非常快，因此我们需要培养出‘正确’的、准备好进入实际工作岗位的人才，”汉尼夫说，“此外，企业更希望招聘熟悉本地文化的本地劳动力，他们会尽量避免雇佣侨民。”

在 2iE，无论是否打算自己开公司，所有的学生都要经过“企业家能力”培训。汉尼夫相信“让每个人都拥有自主创业的可能性非常重要”。她认为：“或许现在，他们还面临着毕业的压力，但未来他们或许会希望开拓他们自己的事业。如果现在不进行培训，将来就会变得很困难。他们今后就很难获得像我们这样的支持了。”

### 马来西亚

位于吉隆坡附近的班吉的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是“青年经济参与计划”的另一家合作机构。这是一所大型的综合性大学。它要求所有专业的一年级学生都上一门必修的企业家能力

课程，并且为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本科学生提供相关选修课程。

“我们希望他们看到，年轻人也可以具有企业家的能力。要创业并不一定要多成熟才行，”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企业家能力与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依贾尼·莫哈末·泰威勒（NorngainyMohdTawil）副教授说。据悉，此中心还开设了另一门针对创业孵化器的企业家能力晋级课程。

“简单来说，我们希望他们对本专业提出新的创意。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感觉无论自己在哪个领域，自己就是企业家。”她说。

晋级课程的学生可以参与到一项初级创业启动项目中。“这个项目是一个能让他们锤炼自己的创业灵感并且做出商业计划书的地方，”依贾尼·莫哈末·泰威勒说，“起步实验室还可以帮助他们联系本国的中小企业代理。”

这个项目的初衷其实只是降低毕业生失业率，并且将大学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但现在有了更广泛的作用。企业家能力与中小企业发展中心主任法瑞沙·迈德·山姆（FarizaMhdSham）教授表示，马来西亚的学生和大部分亚洲其他国家的学生一样，由于文化环境影响，更为沉默寡言、轻声细语，而且比较内向，不太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

通过对中心提供的主要课程的教师进行采



访，企业家能力与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发现“这些学生很不一样，他们更加有创造力”。依贾尼·莫哈末·泰威勒表示，他们学会了一些“软技能”，并拥有了企业家的眼光，能够迅速发现机会中存在的障碍。

### 大学环境

即使企业家能力课程不能直接让学生迅速就业或者创业，也可以让学生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以“青年经济参与计划”的另一合作机构——津巴布韦大学为例，该大学的“帕纳瑞项目”为三所大学的学生提供工作技能和企业家能力的培训。这一项目正在推广到更多的大学，并创造出了一套衡量学生适应能力和面对挫折能力的方法。

“他们发现他们的企业家能力课程反映了参与课程的学生和津巴布韦的其他学生相比具有更好的适应能力。”明尼苏达大学的卡拉·卡瑞尔表示。明尼苏达大学是“青年经济参与计划”大学评估小组的一员。

“青年经济参与计划”给非洲、亚洲和拉美的八所机构提供了证明来肯定其工作。而这些工作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可实现、可复制、可采用的。卡瑞尔进一步表示：“我们将跟踪这些机构，来看看这些学生最后获得了什么样的工作。”

卡瑞尔还提到：“‘青年经济参与计划’很清楚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企业家，但是有些‘软实力’还是需要学习的。”

国际青年基金首席执行官威廉·瑞思相信，企业家能力培训应该拓展到每个青年身上，包括正在经历显著的“青年人口膨胀”的非洲和中东国家。“每个希望提高自己的能力，追求美好未来并对社区做出贡献的年轻人都需要企业家精神，”他说，“这能够帮助年轻人去体验，去尝试——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态度。”瑞思还认为，成功创业所需要的能力对年轻人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也十分重要。“但这些也需要大量的教师、工作人员、导师和教练，我们并不能说开始就开始。”瑞思补充道。

大学一直被认为是学生们最安全的环境，在这里，学生可以挑战创业风险，并将他们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创意付诸实践。“大学需要通过提供知识和技术，努力为学生创造出路 and 机会。同时，大学也是尝试创意的‘试验场’。”万事达信用卡基金的罗伊这样比喻。

“大学……是全人类的‘企业’，培养着一大批寻求能力提升的年轻人。这样想就能让我们更清楚课程和学习经验是怎样被设计的，新知识又是怎样被创造的。但对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或者卢旺达的学生来说，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也有很多需要学习和采纳

的——比如理解现行的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在不同国家之间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将我们的方法推广到这些地方也是可行的。”罗伊如是说。

### 构建网络

再把视线转回到瓦加杜古，一名来自喀麦隆的 2iE 学生克拉文·尼索夫 (ClavinNsunfo) 正准备启动他的生态创业计划。此计划旨在解决塑料袋造成的白色污染。据悉，在瓦加杜古每年会产生超过 16000 吨的塑料袋，其中仅有很小一部分得到回收。

他的创业计划希望将废弃塑料袋和其他原材料混合在一起，生产一种环保的隔热屋顶来替代传统的金属板屋顶。这种隔热屋顶可以降低房屋的温度，而这一点在这个气温经常高达 45 摄氏度的国家来说十分重要。

“非洲需要适合他们本土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西方产品的简单仿制品，”汉尼夫说，“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依靠学生们来进行创新。但他们也需要扶持和资助。”

而 2iE 正是这样一个网络。汉尼夫表示：“我们和包括研究团队、大学和企业等其他机构进行合作。我们的工作建立良好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和企业之间的桥梁。”

“我们帮助我们的‘创业工程师’在国际

范围内获得发展，因为不是所有的技术和装备都可以在本地获得。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在国外，比如法国寻找搭档。”汉尼夫最后补充道。

翻译：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2 级张伊妍

<http://chronicle.com/article/Around-the-World-the/148735/>

### 私立高等教育市场新发展 The higher-education business

#### 巴西的秘诀

近日，两个正在准备合并的巴西教育公司显示了大学如何能够既保质又保量。

在美国，社会上充满了对私立营利性大学的高昂收费和不稳定的教学质量的担忧。2012 年的一项国会质询显示，私立大学在过去的十年内招生量翻了三倍，且相比其他公立和非营利大学，为年龄较大、收入较低，对进一步学习没有做好准备的的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学位机会。但私立大学不断增长的学费和高开除率也意味着大部分学生不仅会一无所获地离开学校，更会欠下大笔债务。

而在美洲的其他地方，对于私立大学的态

度则更为乐观。在经过了同样急速的扩张之后，巴西的私立大学占领了巴西高等教育市场的45%，并且其费用较低，教育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而且由于在巴西，获得学位意味着大幅提高工资，而这一幅度远远高于其他任何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调查的国家，因此毕业生们能够在几年之内迅速还清因学费而产生的债务。

很快，巴西将拥有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私立教育，以及世界上最大的营利性高等教育公司。上个月，巴西反垄断监管机构经济保护和管理委员会（CADE）批准了巴西最大的营利性高等教育公司 Kroton 购买第二大营利性教育公司安航古瑞（Anhanguera）的计划，此次购买将能够创造约 180 亿雷亚尔（约合 80 亿美元）的股市价值。

“（在教育领域）保持高质量很简单，” Kroton 公司精力充沛的年轻总裁罗德里格·加林多（Rodrigo Galindo）表示，“同样，保持数量也不是什么难事。但难就难在如何同时保质又保量。”加林多介绍说，其诀窍就在于要摒弃过去那种“手工式”的教育方式，代之以更加容易实现的方式：采用在线课堂材料和小班讨论课，卫星播送“明星教师”的课堂，并谨慎地授权给上百个地方授课中心。这家公司投入了大量财力开发“合适的”学习材料——



可以根据用户学习进度，针对学习难点提供进一步解释和案例的在线课程，这样的“智能课程”可以有效促使用户快速进步。

在巴西巴拉纳州东南部的一个雾气弥漫的小镇隆德里纳，有一所名为乌诺帕（Unopar）的大学。2011 年，Kroton 购买了这所大学。现在，它已经成为了 Kroton 最著名的品牌之一。十年前，乌诺帕第一个获得了联邦政府的许可开展远程教育。它随后迅速意识到，这种将高质量线上学习材料和每周参与地方授课中心的讨论课相结合的方式，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学位项目。现在，它已经是全巴西最大的远程教育提供者，共有 15 万名学生在全国近 500 个授课中心注册。最偏僻的一个授课中心位于亚马逊河区帕拉州的 Oriximiná 镇，拥有 300 名学生。这个小镇只能依靠小型飞机与外界联系，或是乘坐 12 小时的船才能到达亚马逊河区的中心城市——玛瑙斯。

“这些课程设置起来可不容易，”乌诺帕大学远程教育负责人伊莉莎·阿西西表示，“我

们要努力使它们更为灵活。”阿西西解释说，因为单纯的线上课程有很高的“弃课率”。学生每周都要参加线下的讨论课，并观看一节总部发来的课程录像。而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正是为了保持学生的参与度，让他们跟上课程进度。并且，学生在讨论课上提出的问题也让大学能够获得关于课程运行的及时反馈，使他们能更好地改善课程。

### “巴西好教师”？

安航古瑞公司一直以来以其杰出的线下教学闻名。而为了适应学生们的工作时间，这些线下教学一般都在晚上进行。在他们位于圣保罗中产阶级聚居区的维拉马利亚纳校区，有一个拥有 12 个工作室的媒体中心，该中心向全巴西的其他校区提供一小时长的课程播放。教学出色的老师会被发掘出来，并进行媒体培训。“这就好像是运行了一个有 39 个频道的付费电视网，”安航古瑞公司的信息主管卢西亚诺·帕萨尼（Luciano Possani）说。据悉，帕萨尼曾经在美国卫星电视运营商 DirecTV 的巴西分部工作。

帕萨尼先生认为，由于公立大学一开始就被禁止收取费用，他们很难进入并开拓这片广阔的“蓝海”。但今后，即使是那些对私立教育不屑一顾的人都有可能投入这一领域。巴西

的公立大学的教师经常罢工，而且他们的课程也和实际工作关联甚微。既然公立大学没有服务客户的需求，想看到其保持良好教学质量就变成了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情。“传统课堂的质量时好时坏，不仅老师不同影响教学自然不同，就连不同日子里的教学质量也不一样，”帕萨尼说，“这就像电视直播和电影之间的区别。”

尽管我们今天看到的巴西私立高等教育已经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但巴西也并非没有过对其教育质量进行深刻反思。上世纪 90 年代，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学校学习，由此产生了大量高等教育需求。相比起全由政府资助的公立大学来说，高昂的费用使得私立大学对学生来说仅仅是一个替补选项。而且由于政府的失察和学生们较低的鉴别能力，一部分素质低下的工作人员为学生提供学位越来越没有价值，私立大学的名声也遭到了破坏。

此后，一系列管制措施和激励机制出台，彻底扭转了局面。在巴西，大部分参加学位学习的人需要参加联邦教育署设立的标准化考试，并且每门考试的平均分将会公之于众。良好的评价机制保证了教育市场的产品质量。此外，申请联邦教育贷款的学生们只能将这笔钱用于有良好教学效果的课程，这一措施刺激了教育公司拒绝录取可能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

生。政府还承诺，如果教育机构录取大约十分之一的奖学金学生，则可以获得税收优惠。由于只有获得良好成绩的中途辍学者在社会上才被认可，这也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至少现在，Kroton 和安航古瑞公司都没有考虑要将公司业务拓展到国外。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教学材料都是葡萄牙语的，而且国内市场的盈利已经足够充沛。在每 100 个完成小学教育的巴西孩子中，只有 57 个会结束中学学业，只有 14 个能继续上大学。超过 1200 万名 25 到 34 岁的巴西人完成了中学教育但缺乏社会所需的更高素质。在高等教育市场还有很大成长空间的情况下，巴西似乎不难找到私立营利性教育的成功诀窍。

翻译：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2 级张伊妍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usiness/21605925-two-big-brazilian-education-firms-now-process-merging-show-how-universities-can-do>

## 大学的未来 —— 网络学位 The Future of Universities

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一成不变的高等教育市场将迎来一场积极的革命。



2014 年 6 月，考试结束，假期开始。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其他大学校园里，四处是悠闲踱步的学生。正如学生毕业之后要考虑其未来生活一样，高校也开始需要面对关于其未来的一系列问题。一个世纪以来，传统的课堂教学、填鸭教育和书面考试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现在，三大浪潮将彻底颠覆原先一成不变的授课和学习方式。

高校里这些最聪明的头脑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短缺导致的财务断链。由于高昂的科研投入、教师工资和管理经费，高校的开支在不断增加。这使得政府不得不宣布，无法再像过去一样慷慨地资助高校了。尤其是美国的高校，面对着更大压力。分析预测，在未来的二十年内，美国将会有大量高校面临倒闭的局面。

同时，技术革命正挑战着高等教育市场的传统模式。免费在线教育的爆炸性增长意味着高等教育已经开放给了任何一个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或一部手机的普通人，而不再是少数

幸运儿的专利。财务问题和技术革新同时也带来了第三大变化：原先只招收社会精英的大学现在成为了对普通职员进行教育和再教育的地方。那么对这些学校来说，如何在这场大变革中生存下来？如果它们不复存在，那么什么将会代替传统高校？

### 财政 101

高校一般将其经费的大部分花在学生身上。2002-2012 年的十年间，美国私立非营利大学的学费增长了 28%，而且还在不断攀升中。而公立大学的学费也在 2007-2012 年的五年间增长了 27%。现在，学生如果在所在州上公立大学，平均学费约为 8400 美元；而跨州的公立大学则需要 19000 美元甚至更多。私立大学的学费则要超过 30000 美元，仅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能获得各种奖学金。美国大学生的教育贷款高达 1.2 万亿，其中有超过 700 万人欠款不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欠下这些债务看起来是值得的。因为大部分学生由于获得好的学位之后能找到薪酬更好的工作，很快就能偿付学位花费。但也不是所有课程都能收回成本，而且大学毕业生的高薪酬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更漫长的学习时间才能开始赚钱。从 1999 年到 2011 年，美国大学生人数从 1520 万增长到

2040 万，但 2011 年到 2012 年却开始缓慢回落，减少了 2%。如今，小型私立院校很难保持收支平衡。穆迪评级公司的苏珊·菲兹杰拉德认为这些院校已经在“垂死挣扎”。而普林斯顿大学的前校长威廉·博文也认为高校已经陷入了一场“支出灾难”，即为了吸引学生，高校花费了过多资金在改善研究中心、图书馆和食宿设施上。

相关政治风向也有所改变。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都曾经提到，美国高校如果不进行改变，其未来将并不乐观。这些改变包括降低开支，放弃追随那些中间偏左的政治家的立场，即投入更多资金在公共学术项目上。而州政府削减的教育经费一部分被联邦政府在资助贫困学生的“佩尔助学金”上增加的支出所抵消。但美国大学很快将面临学费超过政府拨款成为第一大资金来源的局面。（见图表 1）



图表 1

亚洲的学费增长也使得中产阶级开始担心上不起学，过去五年内亚洲顶尖的大学学费增长了约 5%。而拉丁美洲国家也在担心是否能保持低廉的学费来继续扩招。在欧洲，由于越来越低的高校学生出勤率，一些高级别资助者也不再愿意资助高校。但欧洲的学费还在持续增长：在 1998 年英国刚刚采用年学费制的时候，一年的学费不过 1000 英镑（约合 1650 美元），而到了 2012 年，学生每年需要缴纳最多 9000 英镑（约合 13900 美元）的学费。

在这样一个糟糕的时期，学费增长并不会轻易停止。然而，目前全世界各个年龄段的劳动者都对继续教育有很大的需求。全球化和自动化进程产生了大量新职业，这些职业对中等水平的教育提出了要求。为了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劳动者们开始寻求更多教育经历。在美国，35 岁以上（含 35 岁）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 31.4 万增长到本世纪的 89.9 万。

工程领域知识分子的增加让自动化（从记账方式到零售技术）能够在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比如，新的网络零售商业模式正威胁着那些刚刚经受了互联网风暴的传统行业。来自牛津大学的卡尔·本尼迪克特·弗雷和迈克尔·奥斯本认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或许有 47% 的职业都可以自动化。因此，在劳动者教育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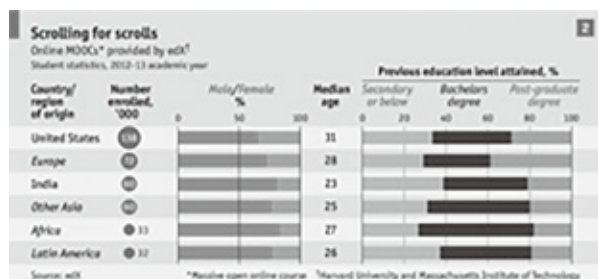
平越来越高的同时，机器代替人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 IPad 指引我们前进？

我们已经知道教育需求在不断增长，那么谁能满足这些需求？传统高校正面临着来自大规模开放式线上课程（慕课 MOOCs）的竞争。这些在线课程可以通过网页或者移动设备应用来教授学生，和他们的历史悠久的竞争对手相比有很大的优势。由于低廉的搭建成本和强大的规模经济，在线课程可以将学生们从固定时间地点上课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从而大幅降低学费，并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渠道。在慕课上每新开一门课只需要花费 7 万美元，这就意味着这些网络课程可以定很低的价格甚至免费公开。哈佛商学院的克莱顿·克里斯滕思认为慕课是一项强大的“破坏性技术”，可以将一些低效的大学推到消失的边缘。他在去年曾预测：“未来的 15 年内，超过一半的（美国）大学将会破产。”

2008 年，第一门慕课课程——在线计算机课程在加拿大开课。2012 年则被称作“慕课年”，因为这一年里世界开始对慕课的理念展现出极大的兴趣：三个慕课网站在 2012 年成立，它们分别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创办的非营利机构 edX，与斯坦福大学合作的机

构 Coursera，以及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师萨巴斯蒂安·特龙等创办的营利性机构 Udacity。这三大机构迄今为止为 1200 万学生提供了在线教育。并且 edX 强调，他们的学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美国人，而接近一半的学生都来自发展中国家（见图表 2）。而 Coursera 新的执行官，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李维正计划着一项以亚洲为中心的业务拓展项目。



图表 2

相对于慕课潜力来说，它还未释放出其全部的“熊彼得式的”创造性破坏力量。大部分大学和雇佣者们还只把在线教育看做传统学位教育的补充，而非代替。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许多世界名校都已经开始减少对在线教育平台的使用。

一个在线课程黄页 SkilledUp 的创立者尼克·吉德瓦尼将在线教育的创造性破坏比作新闻出版行业的“破坏”过程：过去，大型出版商在印刷媒体、客户基础和广告投放方面都占据着垄断地位，然而低成本博客、网站和移动应用的丰富产出挑战了他们的垄断地位。即使

是过去最成功的出版商现在都不得不采取他们竞争对手的电子出版模式。吉德瓦尼认为：“对于那些教同一门课程的 200 名教授来说，未来似乎没什么希望。”

传统大学仍持有几张王牌。除了教学、考试和文凭，大学教育也提供了社会资本。学生能够学习到如何参与讨论并表达自我，以及如何接触并融入集体。但网络教育如何为学生们提供这些？

或许要结合以上两者，我们才能得到答案。edX 的阿南特·阿加西提出了传统美国大学四年学位项目的替代方案：学生们第一年在慕课上进行入门学习，第二三年到实体学校中进一步学习，最后一年则可以开始兼职并在线完成本科学习。这样的“混合”学习方式或许比四年纯粹的网络教育要更有吸引力。同时，它也更适合那些学习的同时要工作或者抚养孩子的人，让他们不必费力去调整时间表来适应学术课程。此外，这种方式也能提供小众的、个性化的课程搭配方式，比如在慕课的一所大学学习葡萄牙语的学生同时也能上法国存在主义课程。

一些大学已经把在线课程加入他们的教学大纲。在巴西，Unopar 大学提供了价格低廉的学位项目，这些项目采用在线教材和每周一次的讨论课，课程通过卫星传送。在每



股哟，Minerva 大学有着堪比常春藤大学的严格招生标准，但是学费却低得多——和常春藤高达 6 万美元的学费相比，Minerva 只需要 1 万美元一年。Minerva 的第一批 20 名学生刚刚在旧金山完成了他们第一年的学业。随后，他们将在网络上进行接下来的单独辅导课程，而不必身在美国。他们会主要待在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这也会成为未来的雇佣者看重的一大卖点。

### 您查找的学位不存在？

网络学习也有其缺陷。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州立大学的一项旗舰计划的数学和统计学课程是由 Udacity 提供的，而这些课程去年已经被叫停。相比起在校学习的学生在入门代数课程上 30% 的通过率，在线学习的学生仅有 18% 的通过率。而且随着学习内容越来越复杂，这一差距还会继续扩大。“慕课的教学方式应该马上得到改进。”来自 Udacity 的特龙相声承认。他认为圣何塞州立大学的试验表明学生们要想更好地利用大学在线课程，还是需要更多个人指导。美国一项调查显示，70% 的慕课学生已经拥有了一个学位。如果慕课提供者要和传统大学竞争，就需要在专业教学方面加以改进。EdX 的阿加瓦尔先生希望能在假期时间里提供更多课程，这样学生们就能利用这些课程获得

额外学分，以弥补他们错过的课程。

另一方面，网络教学的反对者们也将矛头指向了高退课率：在首次注册慕课的学生中，仅有 10% 完成了他们的课程。这一点或许不会对慕课提供的课程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微乎其微的参与率损失或许表明很多注册者在注册时并没有完成课程的决心，但由于慕课大部分依靠提供结业证明来盈利，保持相对完整的毕业率还是很重要的。有些课程提供者精炼了其课程，使其在起步阶段更容易完成。EdX 发现大部分退课的人都是在课程开始不久退课的，这和传统大学中，学生在第一年试听课程来决定他们所追求的学位目标如出一辙。

另一种担忧的声音表示，学生们可以通过让其他人代替他们参加在线考试来作弊。德国去年建立的一所网络学校 iversity 正尝试采用有人监考的现场考试。而 Coursera 也提供了付费的身份验证服务，这项服务可以通过纪录学生独特的输入方式来验证学生身份。

网络课程也引起了学界的反对，因为他们担心网络课程的普及会导致大学削减其职工数量。当哈佛大学政治学导师迈克尔·桑德尔同意将自己一些广受欢迎的课程上传到 EdX 上的时候，他被一群加利福尼亚学者批判为是支持一种“严重损害我们的大学”的教育模式。

这些学者认为，网络课程企图“用廉价的教育取代大学教员”。还有人担心那些从网络课程受益的人会像桑德尔教授一样成为“超级明星”，这样他们和他们的同事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他们或许是对的：上课更为生动的老师比那些无聊的老师要受欢迎得多。而现在和过去不同的是，有更多的学生可以共享这些生动的课程了。

### 学分：一大关键因素

目前，慕课提供者利用发放结业证书来吸引学生。而这恰恰证明了完成一系列课程对学生们找工作是有帮助的。但许多潜在的学生犹豫不决是否要报名，正是因为他们不确定这些结业证书会不会被认可为正式的学位证明。而随着在线课程和现存的传统教育结合越来越紧密，这一切开始改变。麻省理工学院的4500名学生中超过一半都在慕课上完成他们的部分课程。加利福尼亚州主要招收成人教育学生的肯尼迪大学也已经开始承认EdX上的慕课学分。

但大部分大学并没有这样做。至于高校置身事外的原因，我们或许可以从欧洲的高校中窥见一斑。为了推进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学生流动性，欧洲的学生可以在签署了里斯本认可公约的53个国家中的任何一所大学之间转换

学分，“无论这些知识、技巧和能力是通过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方式获得的。”而现在的趋势是，为了更好地转换学分，欧洲的大学也开始认可慕课学分。“欧洲并不会马上就采用这种新的学分递交形式，”西班牙IE大学校长圣地亚哥·英格斯预测。但其他人显得更为乐观，iversity的总经理汉斯·克罗帕指出，由于学生们可以看到所有课程，他们也就更能评判慕课课程的质量好坏。他相信一旦学生开始在慕课上完成课程，他们就会强烈要求这些课程获得认可，那么欧洲的大学就很难拒绝认可一些最优秀学生的要求。

同时，第二代慕课正在尝试模仿传统大学的课程。佐治亚理工学院与Udacity同美国电信公司AT&T合作，创立了一个计算机专业的线上硕士学位项目，学费7000美元。这一学位和另一个相似的线下学位项目同时运行，而后者需要大约25000美元的花费。麦肯锡教育咨询公司负责人莫纳·莫斯黑德由此发现了机遇：“如果雇佣者们同等承认这两个学位，那么一旦慕课的硕士项目开始运行，类似项目就会接踵而至。”

即使一些公司已经开始自己开设网络课程（比如谷歌就在慕课上开设了一门教授如何分析数据的课程），高校仍然是开课的主体。网络课程公司为了鼓励高校将其最好的

学术资源投入到课程中，就必须给予他们一些经济上的刺激。EdX 就曾表示过他们是“自给自足的”，但是从未公开过其盈利的细节。根据《高等教育年鉴》，去年 EdX 的政策是，如果大学将其课程收入的最初 5 万美元上交给 EdX，并提供今后课程的提成，就可以使用他们的网络平台。另外一种营利方式是缴纳 25 万美元的“辅助开设课程经费”，以及每个学期课程的补充费用，就可以开课。Coursera 则仅通过提供结业证明来营利。自其 2012 年建立以来，Coursera 的收入大约为 400 万美元，其中每个学生大约缴纳了 30-100 美元。另一些网络教育公司正在努力通过其他方式取得收入。去年 Udacity 经历了一次“突变”，他们宣布其原先的免费模式已经不再可行，将会开始提供收费的专业在线培训。尽管线上课程比线下课程要便宜得多，但如果网络教育不对传统大学的课堂互动模式进行复制，就很难留住学生。提供教师在线的讨论课和提高互动水平或许是有效的举措，这样授课者获得的在线反馈就会更加具体和细节化。但类似的改进会大幅提高成本，因此不同的慕课“生态系统”最后或许会发展为多种筹措资金的方式——从最基本的免费服务到更昂贵的定制服务，不一而同。

最不用担心被那些网络教育竞争者们打败的恐怕就是精英大学了。他们拥有历史悠久的良好声誉和较低的师生比。对于那些在提供学位的同时，也提供了良好的社交圈子的常春藤大学、牛津 - 剑桥联盟和其他大学联盟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而那些略逊于这些大学联盟的高校对增加学位成本很敏感，因为投入 - 产出比极其微小。这些高校或许将会通过增加网络课程，缩减线下课程的方式来获得更多利润。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支出，还可以保持一部分课程还在校园进行的良好名誉。

而根据新泽西肯恩大学的吉姆·勒曼的说法，在这场竞争中最脆弱的就是那些“位于中间层的、为美国培养教师和中层管理人员的高校”。他们可以轻易被网络课程所取代。因此尽管那些可以与地方雇佣者建立良好联系的社区大学现在看起来还很顽强，但确实相对更弱。

从 2012 年第一波大规模开放性课程的浪潮至今，已经开始出现一阵质疑这些课程的失败和商业上的不确定性的“回潮”。但如果批评者们认为他们可以完全对慕课的进攻“免疫”，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网络课程可以迅速改进它们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而传统大学则面临着严重的开支和效率危机，似乎不太可能从公众那里获得更多的收入。

一位英国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于1858年出版了《大学理念》一书，在书中，他将启蒙运动后的大学概括为“一个通过人际沟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思想传播和流通的地方”。这个理念至今仍然激励着这个时代，因为通过互联网进行人际沟通实际上已经变得没有限制了。但这位红衣主教也曾经警告说：如果没有良好的人际的沟通，高等教育将会变成“像冰一样，像石一样，像铁一样的教育”。而这，正是网络高等教育新浪潮

应该避免的。但作为这一新浪潮的补充，传统昂贵的高等教育模式更倾向于进一步发展，而不是消失不见。

翻译：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2 级张伊妍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605899-staid-higher-education-business-about-experience-welcome-earthquake-digital?zid=316&ah=2f6fb672faf113fdd3b11cd1b1bf8a77>

## 澳大利亚教育部长访问北京大学

9月9日下午，澳大利亚教育部长克里斯托弗·派恩（Christopher Pyne）一行到访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在湖心岛鲁斯亭热情会见了派恩先生一行，并就中澳两国的教育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

王恩哥首先对派恩先生的到来表示热情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他指出，随着北京大学的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中澳两国的教育交往不断增强，学者、学生的交流互动也愈发频繁。

在会谈中，派恩先生提到，这是他第一次作为教育部长来华。他指出，中澳两国建交已逾四十年，两国在教育领域合作紧密，对于两国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都大有裨益。澳大利亚高校

在自身建设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国际化发展，并且目前已有约百分之四十的澳大利亚学生在学习除英语之外的第二外语，以更好地为走向世界、感受各国文化作准备。

会谈结束后，派恩先生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师生代表作了题为“中国与澳大利亚：我们珍视的教育伙伴关系”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中国高校在世界排名前两百的学校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位置，高等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且潜力巨大。提高一个国家整体的教育水平不仅对于青年人自身发展有深远影响，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 柏林自由大学的国际化

### 1 历史：柏林自由大学逐步国际化的改革进程

柏林自由大学 1948 年在西柏林成立，并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德国一流、大型高校之一。由于柏林自由大学的理事会被赋予特殊的法律地位，并对自己的经费有高度控制力，该校一直都比德国大部分公立大学拥有更多自主权。因此，柏林自由大学一直是德国高校改革的先行者。

柏林自由大学立志成为能为年轻学者提供一流设施的国际性研究型大学。其改革的历史发展进程主要分为三步：

第一阶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柏林自由大学改革了决策机制，废除了传统的多重重复管理的机制。学术委员会负责监督各项学术活动及各院系活动、院长及校长办公室等事务，同时拥有了实际上对资金的控制权，为拓展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建立了新的行政机构，引入了成本效益会计方式。对每个项目有了具体的指标，通过衡量绩效指标来分配资金。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外籍学生的录取情况，以及外部学

者的参与情况，开始逐步迈入国际化的进程。

第三阶段从 2003 年开始。当时计划将所有的学位课程都整合到全欧洲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框架之中。之后柏林自由就开始实施欧洲的学位标准，目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专业的学士学位课程也都已经完成了过渡。

第四阶段从 2004 年开始，开始真正走向国际化。学校实施了新的质量管理项目，推行了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学校广泛达成共识：国际研究型大学内部条件与结构是其成功与否的重要前提。首要就是进行网络交流，大学之间要搞联合研究，在科研和教学方面要有质量保证措施。但德国科学未来的发展将受到人口趋势的影响和人才外流的影响，同时，国家也日益需求高水平的研究。因此，学校认为必须在研究领域继续走在前列，并使科研项目吸引更多的德国年轻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操作之一就是进行战略转移，使学校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网络大学，积极寻求合作部门及经验。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改革本身与国家提出的“精英大学”计划紧密联系。2004 年，德国前联邦教育部长布尔曼首次公开提出实施“精英大学”的计划，之后改名为“卓越计划”，

并于 2005 年 6 月在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选举中表决通过。

德国自由大学在德国联邦政府的“精英计划”评选中胜出，并由政府为其未来发展战略提供资助。在精英选拔中脱颖而出，跻身于世界顶级科研机构的柏林自由大学是德国九所精英大学之一。这九所大学在德国政府“精英计划”评选中均通过三个资助标准的考核，并使学校的精英未来规划获得国家资助。至此，自由大学得以将自己在高校竞争中定位为“拥有国际化网络的研究型大学”。大学的规划包括三个战略中心：集群发展中心，研究生教育中心，国际交流中心。

## 2 国际网络大学的构建——卓越计划推动下的国际化

### 2.1 国际网络大学理念的提出

2005 年德国联邦和州发起了卓越计划，来促进德国高校的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卓越计划不仅促进了德国大学的结构调整和形象建设，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大学的国际化。在卓越计划中，涉及到三条推动路径（标准）：研究生院、精英群体、未来理念。响应卓越计划的要求，柏林自由大学建立了三个研究生院和两个精英群体，并且提出了“国际网络大



学”（Internationale Netzwerk Universität，简称 INU）的未来理念。这个理念涉及到整个大学。

在此基础上，柏林自由大学同全世界建立联系，深化同所选定的伙伴大学的合作；促进国际交流，并发展有国际特色的学位项目，以面向全球就业市场培养学生；在承担全球责任的前提下行事——通过对紧迫的未来问题的研究，对其他国家学术建设的援助以及保证科研和教学自由。

### 2.2 国际网络大学理念的内容和特色

INU 理念基于三大支柱：科研、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换，并据此成立了三个战略中心：群体发展中心（center for cluster development，简称 CCD），达勒姆研究院（Dahlem Research School，简称 DRS）和国际合作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简称 CIC）。

## CCD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相互联系及互动的合作网络已经成为公司最宝贵的资产之一。柏林自由大学也与国外许多大学进行交流，并不断由集群发展中心对它做出评估和引导。通过达勒姆研究生院组织的一些国际交流，在不同的国家创立了各种国际交流中心，这些中心为大学上层领导提供了中间媒介，并像集群项目一样为研究生教育服务。

集群发展中心是一个可以支持年轻学者、年轻科学家和整个大学迈入国际科学社区的机构，它更好地发展了研究生课程并组织开展研究者与学科之间的国际交流合作。该中心的任务第一是监督优秀集群的持续发展；第二，进行组织内改革；第三，评估其成功程度。该中心将持续建立大学的集群体系，识别有卓越潜力的研究领域并促成研究的开展，确定这些领域对学校的作用。第四，该中心在学校机构之外建立独立和稳定的联系网络。

CCD 的中心任务是支持 FU 的教授建立科研网络，对社会紧密相关、全球的和面向未来的问题进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通过战略性的研究计划，CCD 支持 FU 研究平台的构建，即所谓的研究领域，并引导其发展。CCD 通过对研究的计划、调节和控制，对学者和高校领导来说都是一个支持单元。

## DRS

DRS 是作为人才培养的总支持机构而建立，也是一个集群发展模式，它负责管理专业领域之间跨学科的合作，符合跨学科研究的规律，有利于促进国际联合项目的开展。它将不同专业方向的博士生项目整合起来，保证了高质量和全面的研究生培养。DRS 既致力于推动已经建立的研究生院，也推动新建研究生院。2007 年底，DRS 纳入了 12 个新的博士生项目，2010 年夏为止总共有 16 个项目在 DRS 名下。学校的科研人员和其他机构的科学家一起工作，同时吸引更多的外国研究生和外籍科学家，促成了年轻科学家之间关系网络的建设，进而确保了经验的传授和研究能力的继承与发展，是一种国家化的全球合作的方式。

同时，由于所有的研究生项目都邀请国外的学者参加，因此，该网络的功能是鼓励外国博士研究生在自由大学撰写他们的论文。该中心将设置适用于各学科研究项目的基础课程。这将使自由大学的研究与教学和同类的欧洲教育机构同步，从而招收优秀的年轻学者，并使其立足于国内外学术界。

DRS 的“Welcome Center”让外国博士生在柏林更轻松地开始学习生活，FU 通过迎新周和其他的帮助来帮助给外国博士生的融入和适应。



## CIC

CIC 是为了将 FU 已有的很好的国际网络和知名度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支持学校层面和专业层面的国际化活动，确定目标、制定和实现计划，为国际化服务。可以是有时间限制的活动如给外国博士生的短期奖学金、旅游经费或者会议经费，或者长期的研究和做项目，此外，CIC 还支持建立了 7 个驻外联系办公室，在当地招募青年科研人才、探测欧洲和世界各地在科研促进政策和高效发展方面的趋势并将其传达给 FU。其工作是为了促进 FU 的科研和国际合作。

CIC 是柏林自由大学国外分支机构的网络核心。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德国和欧洲教育研究机构的“人才流失”问题。另外，该中心还启动和协调一些海外研究项目，作为达勒姆研究生院研究生项目的一部分。参与这些项目的学生被鼓励到柏林自由大学国际合作网络成员国去学习。该中心将促进这些海外分支和当地学术机构的合作，以吸引年轻学者来自自由大学。该中心在完成自由大学教学队伍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将外籍教师人数比例从目前的每年 20% 提高到 25% 是我校卓越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各国际分支机构还应该成为学术交流的场所。

三个机构之间相互关联。到 2010 年年中，

三个中心支持了 427 个项目，为此有近 800 万欧元的拨款。这三大支柱是柏林自由大学高等教育战略的核心。他们的特色是：有组织地采用上下政策，来寻求培养国家急需青年才俊的途径。有了这样的战略观念，自由大学根据自己的目标借鉴国际上的成功模式，对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做出了反应（集群中心、研究生院和大学分支机构）。这三个面向未来的发展规划巩固了支配这些网络形成的基本理念，它们的建立是为了达到同样一个目的：所有三个中心都将鼓励创新性研究，加强与外国学者和科学家的合作，培养新一代学术人才。

这三个中心的特殊意义在于，自由大学可以通过这些中心吸引国际上的知名学者，进而巩固其在国际上领先的研究地位。集群中心和研究生院的负责人一起将组成有效的自由大学卓越委员会，为校长办公室提出指导性政策并监督政策的实施。由优秀的大学管理人员（在大学改革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自然、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顶级学者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将为自由大学的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此外，为实现对整个未来理念项目的管理，成立了国际网络大学班子（Stabsgruppe Internationale Netzwerk Universität，简称 PINU），PINU 的责任在于向科学审议会（Wissenschaftsrat）和德国科学学会（DFG）

作报告（分别为“进程报告”和“使用证明”），来发展质量保障体系。

在 2007.11.01 到 2012.10.31 期间，为推动 INU 理念，柏林自由大学总投入了 36353720 欧元，这些资金的分配如下：CCD 为 10657433，CIC 为 6593333，DRS 为 7086900，Stabsgruppe PINU 为 4957100。总推动资金中三分之二都是直接用于学者和专业领域的工作，三分之一用于国际合作中心的建设和运作。

当今的科学和研究是日新月异的，认识和利用国际发展趋势和高校协调的新模式对 FU 的未来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柏林自由大学建立了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一个由来自十几个州的高等教育研究领域、高校管理层的专家和研究人員、国际化机构的代表和科研带头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是柏林自由大学主席团的战略咨询机构。

### 3 国际化的机构建设

#### 3.1 国际化的核心机构——CIC

CIC 于 2008 年开始运行。首先，CIC 需要为下一年确定一个有优先目标的全球理念和有活动重点的指导方针。考虑结构化博士学位项

目的推动以及国际研究项目的发展，改善国际合作，并都同另外两个战略中心 DRS 和 CCD 紧密合作。同这项目标紧密相连的是同全世界核心伙伴的战略性网络化的共同目标。在世界各地建立的联络办公室应当为 FU 增强其国际知名度奠定基础。在国际化道路上迈出的这一步是要吸引高水平的博士生和学者，就像国际校友会的工作一样。

科研的国际化提升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 FU 根据科研数据库的评估以及对地区和专业重点的分析绘制国际科研活动图。第二步是通过 CIC 进行一个对学者关于资金支持期望的调查。这使得 CIC 有办法将全球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步骤当中。学术团体的国际化活动的资金有了一个“工具箱”，其目的是推动博士生培养的国际化和国际科研项目。“工具箱”包括如下的一些措施：为 FU 的博士生、博士后和科研人员提供短期奖学金，使其能够在国外逗留，开发新的合作项目。反过来，也推动外国的博士生、博士后和科研人员同 FU 的同事一起开发新的科研项目。此外，还有实验奖学金为 FU 有潜力的博士生和洪堡学者考虑科研项目或者共同起草提案提供可能。此外，通过工具箱的“直面发明使命”（探寻可做可能的代表团旅行），组织和参加国际会议和夏季学会，世界各地的市场推广活动以及国际校友会活动，

都会得到资金支持。

CIC的一个工作重点是通过桥梁资金支持来填补柏林自由大学供给上的漏洞。在资金分配上关键的标准是项目所保证的持久性。一旦一个项目有一个申请，特别是DFG和DAAD的项目，CIC会给予建议并跟踪这项申请。虽然这样做的成果到中期才能看出来，但是现在国际博士生和洪堡奖学金获得者的数量已经表现出了增长趋势。此外，两个国际研究生院申请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CIC的支持。对于和柏林自由大学建立大学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学位项目的需求明显增长，特别是来自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这同CIC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在合作中，CIC同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合作特别突出。

CIC在柏林自由大学学校内部同另外两个战略中心保持紧密合作。CIC资助了CCD项目中的40名科研人员的国际活动。此外，CIC还指导国际研究生院的申请并通过联络办公室在国际上宣传DRS成就。最后，加强同柏林地区的机构的合作也是CIC的一个重要目标。

### 3.2 CIC 下属的驻外联络办公室

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方设立联络办公室对精英理念中的国际化战略有核心意义。这些办公室的任务有：

- 支持科研合作和共同项目
- 吸引研究生和研究人员，以及征求方案和项目。
- FU 和当地信息的交换
- 在当地推动国际校友工作
- 组织活动宣传推广FU和它的项目。

出席、联络、获取信息——这是FU联络办公室的主要任务。2005年建立了纽约办公室、2007年北京办公室、2008年新德里办公室、2009年布鲁塞尔办公室和2010年莫斯科办公室、开罗办公室和圣保罗办公室。他们的工作涵盖了其所在的整个地区。这些联络办公室的主任往往集外交官、联络人、市场营销专家、顾问和科学战略家为一体：他们为想要来FU学习或者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提供建议，他们支持学者开创双边科研合作，他们组织会议、维护和FU在当地的校友会的联系，搜集该地区的科研和高校政策发展信息。作为未来理念的组成部分，这些办公室的目标是通过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科研质量。目前柏林自由大学已同全世界100多所大学和45个研究机构有伙伴关系和交换项目，在欧洲流动性网络伊拉斯莫项目中有340个伙伴关系。

### 3.3 国际交流中心

国际交流中心是FU国际网络的核心部分。

它主要通过其在北美、拉美、东亚、印度、远东以及东欧和西欧的分支机构来组织工作。

2006年成立的地区研究中心，将FU的地区研究和柏林以及勃兰登堡的其他研究机构联系在一起，该中心特别支持及交流中心。在此，

- 给予学习或者教学的访问学者的国外奖学金；
- 照顾DRS的博士生以及在当地大学的学生；
- 接受外国博士生在DRS的申请；
- 创建和组织同国际学校合作间断性的硕士和博士学习项目（联合学位）以及夏季学校；
- 在国外建设校友网络；
- 为国外学者在FU争取访问机会并照顾其在FU的学术逗留；
- 为进行学术交流组织学术会议和FU的科研展示；
- 招聘在国外的德国学者，达到“人才回流”的目的；
- 为FU的学者去国外进行访问逗留提供机会并进行照顾；
- 获得国外企业以及公共机构的研究需求信息，并将其介绍给FU；
- 关注当地的科学和科学政策的发展。

### 3.4 传统对对外事务机构——大学外事部门

FU校务处的外事部门10多年来建立了北美/大洋洲小组，拉美小组，东亚小组，东南亚和南亚小组，东欧小组和西欧小组，针对特定的地区、国家和语言来进行分工工作。在所报告时间段内，中心任务包括：

- 对已有的伙伴关系进行评估，建立新的合作，以推动学生和学者的交流；
- 在伊拉斯莫和LLP项目框架内建立联系；
- 参与欧盟项目“Erasmus Mundus External Cooperation Windows”和后续项目“Aktion 2: Erasmus Mundus Partnerschaften”；
- 为“Erasmus Mundus Aktion 1”（国际硕士和博士项目）的申请提供建议；
- 在纽约、北京和新德里建立FU的驻外机构，在建设期间提供对其支持；
- 建立在国外的德国伙伴中学学校网络，首先从拉美开始，然后纳入全世界范围内大学预科；
- 组织为FU的学生提供在国外学习逗留信息的活动，为国外项目学生提供指导；
- 照顾伙伴大学以及洪堡基金、DAAD和富布赖特委员会的奖学金范围内的国外访问学者和学生。

- 提供国家和国际的校友会活动；
- 照顾 DAAD 推动的地区和精英中心（北大的德国研究中心，FU 的德俄跨学科科学中心等）。

#### 4 国际合作模式

在国际化战略中有四种合作模式：战略伙伴关系；传统高校伙伴关系，特别是指个别的人员交换、招募青年科研人员的伙伴关系、专业研究合作。

2009 年一年之内柏林自由大学同国外大学签订的协议（作为传统高校伙伴）从 154 项增长到了 165 项。这个增长主要是东欧和亚洲的大学对柏林自由大学迅速增长的兴趣，他们希望为他们的学者提供在柏林自由大学进行研究或者学术逗留的机会。当然，由于缺乏人力和财力，并不能实现所有的合作愿望。因此就需要集中在项目和专业领域的合作，以及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在战略伙伴关系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同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和哥伦比亚大学（纽约），FU 同这两所学校在科研数据库上有十分紧密的合作。其他的还有同俄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合作效果也十分显著。这种伙伴关系的目标是使 FU 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有特色和合作网络最为完善的大学之一。

柏林自由大学的国际化网络化构建的目标之一是：同国外大学的大量的伙伴关系和交换项目应该在未来通过同和选定的国外大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得到完善并有所聚焦。通过这种全面的、十分活跃的合作可以将高校的优势捆绑起来。其目标是将整个大学生活囊括进来：教学和科研、学生的交流、博士生的共同培养和客座教授的逗留。在战略伙伴关系中，双方研究机构的学者联合成一个工作小组，发展客座教师项目以及双学位项目，制定申请第三方资助的共同研究计划，共同举办会议、座谈和系列讲座。

目前柏林自由大学已经同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北京大学、圣彼得堡国家大学和韩国大学联盟（首尔国立大学、Sogang Yonsei, Korea und Ewha Womans）建成了第一批战略伙伴关系。面向日趋国际化的就业市场培养学生，提供跨文化体验，促进国际交流，语言学习，并推荐在国外的实习。

#### 5 丰富的国际化项目

##### 5.1 交换项目

交换生项目从建校开始就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批交换生于 1949 年被派往美国斯坦福大学。不久前自由大学加入了欧洲 Tempus 和

Erasmus 交换项目，与 50 多所高校签订了直接交换协议。年轻科学家可以通过参加达雷姆研究院的科研项目而获得资助。

在签订了很多新的伙伴关系合同以及在 Erasmus/LLP-Programme 框架内的合作之后，目前有同 41 个国家 405 个国外大学的交换学习项目名额。2007 年之后，由于本科和硕士学位改革，伊拉斯莫学生数量稍有下降。目前伊拉斯莫学生数已超过了 2007 年。2007 年 FU 有 898 名伊拉斯莫学生，528 名学生通过伊拉斯莫项目出国。2010 年则有 933 名伊拉斯莫学生，554 名 FU 学生出国。

此外，FU 从 2007 年开始参加了欧盟项目“Erasmus Mundus External Cooperation Windows”和后续项目“Aktion 2: Erasmus Mundus Partnerschaften”。通过这些推动项目，要么是已有的伙伴关系得到了完善，如同中国、印度和南亚地区，要么一些国家和地区新加入了交换项目，包括伊朗、伊拉克、也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同南非的合作也从 2010 年开始。目前通过这个项目 139 人获得了 1000 欧元的学习资助和 2500 欧元的教师资助奖学金，来资助他么在 FU 或者在伙伴学校的逗留。这之中有 47 名本科生、27 名硕士生，26 名博士生，

13 名博士后和 26 名教师。在 2010 到 2013 年期间，该项目资金有 289 万欧元。

新的 DAAD 奖学金项目 PROMOS 在 2010 年为 FU 的 100 多名学生提供了资助，资助他们自己组织的在大概 30 个国家的逗留——学习、语言学习、项目研究或者实习。

## 5.2 为外国学生提供的学习机会的固定项目

柏林自由大学为国外学生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来柏林学习的机会：

### FUBiS (国际夏季和冬季学校)

FUBiS 向国外学生提供了 12 个专业不同主题的夏季和冬季课程，特别是艺术史、政治、经济和文学以及 5 个等级的德语课和一个专门的经济德语课。该项目的参与学生数从 2007 年的 485 人增长到了 643 人，增长率超过了 30%。

### FU-BEST-FU 欧洲研究项目

2007 年至 2010 年 FU-BEST 项目参与学生数从 2007 年的 127 人增长到了 190 人。FU-BEST 作为一个外国项目主要是针对北美学生。学期的时间同美国学期相一致。

### BCGS (Berlin Consortium for German Studies)

在 BCGS 项目中，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

其他的常春藤大学为其学生提供在柏林一到两个学期的短期学习机会。在这个从1995年就由外事部门负责的项目中，每年有约30名美国的学生在FU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进行学习。反过来，项目也为FU的学生提供在美国大学的学习机会。

此外还有 Berlin Program for Advanced German and European Studies、北大的德国研究中心（ZDS）以及 PROFIS 等等项目。

## 6 由内而外的国际化

### 6.1 学习的国际化

FU 比德国其他学校更快进行了博洛尼亚改革，采用本科和硕士学位，并且和国外伙伴高校合作开展双学位项目。（一些项目举例）。提供地区研究的学习机会。强调和重视外语的学习。FU 有德国最大的大学语言中心，既为德国学生学习外语，也为外国学生学习德语提供课程。

### 6.2 教学和科研的国际化

建立科研网络——即国际化网络也要专业化——属于是FU未来战略的核心。其目标是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士生和学者。为此FU在近些年发展了双边和国际化的博士生项目，

向外国的博士生提供提供出色的工作环境。与此同时也提供很多同国际学者联系的机会。并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和人士讲学，邀请伙伴高校的科研人员或教师作为访问学者，创造国际化学习氛围。

柏林自由大学在近年来建立了 DRS、International Grauiertenkollegs, Graduiertenschulen, International Max Planck Research Schools 等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机构，采用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吸引外国优秀的学生和学者。外国博士生的比例从2007年的17%到2010年上涨到了20%。10%的学者有国外经历。在洪堡奖学金（德国最大的国际顶尖学者邀请项目）中，FU在2007年到2011年都位居第一。2005年和2010年在FU读博士的人数从400涨到了1130，位居德国第一。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才、来自巴西的科学家、博士生短期学习（都是项目简介）。DRS、国际研究生院、研究所、国际马普研究院、国际博士后奖学金。

此外，FU在同国外的伙伴合作中实现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的责任。这涉及到科研自由、对处在转型中国家在科研和民主结构建设上提供援助，比如阿拉伯国家。FU是第一个参加“风险中的学者”国际网络的德国大学，向在自己祖国受到政治迫害的学者提供避难地。

### 6.3 开放的校园

FU 的国际协会每学期组织 30 多项活动，丰富外国学生的娱乐生活，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柏林自由大学的研究人员定期向公众开放其研究机构、实验室以及图书馆，比如在“科学长夜”或“开放日”活动中。学校合作中心而经常面向中小学生学习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其中包括“儿童大学”项目和被称为“NatLab”和“PhysLab”等在专业实验室进行的暑期学校项目。此外，大学还经常面向公众举行主题丰富多样的讲座。政治家、外国嘉宾、各国大使和经济领域的代表经常出现在自由大学的各项活动当中。国内外众多杰出人士曾获得自由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证书：联合国前秘书长 Kofi Annan，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Orhan Pamuk 和 Günter Grass，以及文学批评家 Marcel Reich-Ranicki 和作家 Salman Rushdie。

### 6.4 国际校友会工作

在 DAAD 校友会推动项目（Alumni-Plus）的帮助下，国际校友会工作获得了重要的第三方资助，在 2009 年之前都是由外事部门单独支持的。从 2010 年开始在 CIC 内部进行了一

个关于国际校友会的问卷调。维护同之前学生和学者的关系对 7 个驻外联络办公室的工作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将搜集校友的联系方式以及在当地组织和计划针对这个群体的活动。通过李生勇 DAAD 的 Alumni-Plus 资金，可以组织更多的工作坊和校友聚会。通过国际校友会工作，FU 将一系列的目标联系起来，比如说，提高 FU 在国外的知名度，找到在国外潜在的对话伙伴（非学术机构的）。

### 6.5 积极参与第三方机构国际化项目

充分加强高等教育第三方支持机构如洪堡基金会、DAAD 和富尔布莱特委员会的合作，获得国际化的资金支持。2010 年，600 多名外国学生在 DAAD 奖学金的帮助下在 FU 学习，数量在德国大学中是最大的。同年也有 400 名德国学生在 DAAD 奖学金的帮助下到国外学习，也是德国大学中最多的。此外，还有通过伊拉斯莫项目、洪堡奖学金等项目推动学生、学者的交换。

加强同校外研究机构的合作。如和马普索合作建立了三个国际马普研究院（International Max-Planck Research School）等等。



## 《首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现状研究》

马万华，李岩松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教委”)的委托，从 2012 年开始，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对“首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现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该书是其课题研究系列学术成果之一。

该书首先从理论层面上系统的梳理了现有国内外的相关理论研究，制定了一个描述性的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这一指标体系，从院校国际化实践入手展开调查和研究。该研究在现有的国内外较成熟的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进行综合、整合、制订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并且通过外事管理部门的行政人员和专家咨询对国际化指标体系进行修订，获得了新的兼具评价和指导功能的国际化指标体系。该体系对于指导我国国际化评估和发展水平应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该书对于政策制定者、相关研究人员、学者和学生了解目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理论和指标体系建设、了解首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现状和面临的挑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